

## 编 纂 体 例

一、本书收录的红医故事根据已经公开出版的文献史料、报刊及主流网站的文章编纂而成。

二、对每个红医故事均在首页进行了页下注。

三、对红医故事中的主角（有资料记载的）均在文后做了相应注释。

四、每一个红医小故事的标题均根据故事的主要内容来拟定。

## “红医精神与红色卫生文化资源文库”编辑委员会

主 任：李恭进 刘 潜

副主任：刘 民 陈 亮 黄瑞忠 叶军明 肖树辉

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刘善玖 严宜明 连 璐 辛贇海  
范小娜 钟继润 黄 诚 曾新华  
赖传景 谭宗梅

## 《红医故事》

赣南医学院中央苏区医疗卫生史与健康中国战略研究中心编

主 编：曾新华 刘善玖 钟继润

副主编：张莉芳 李 媛 张勇华 李 明 孙帮寨  
叶 萍 李 霞 刘孝杰 钟世华

# 目 录

前言	1
一、红医领导人篇	
1. 毛主席的医学新理念	3
2. 总司令让房	4
3. 朱德当“医官”	6
4. 陈毅激励伤病员	7
5. 彭德怀巧用火炉治病	8
6. 周篮智救陈毅	10
二、红医人物篇	
1. 南昌起义的第一批巾帼英雄	12
2. 张汝光学医	14
3. 吴行敏艰辛求医	16
4. “红色华佗”戴济民	18
5. 李治二三事	20
6. 何复生魂留苏区	22
7. 红医陈义厚	24
8. “红色神医”傅连璋	25
9. 傅连璋弃轿	27
10. 纪念白求恩同志	28
11. 为革命绽放生命	30
三、红色医院篇	
1. 中药铺锐变红军医院	32
2. 福音医院初现革命激情	34
3. 野战医院找粮食	36
4. 深山找医院	38
5. 傅连璋献医院	40
6. 黄冈医院	42
7. 井冈山红军医院	44
8. 行进的医院	46
9. 闽西红军医院	48
10. 红军总医院	50

11. 红色医院觅红医·····	52
12. 系在腰间的“野战医院”·····	54
13. “红色华佗”办医院·····	56
14. 为了信仰·····	58

#### 四、红医救护篇

1. 傅连璋接生·····	60
2. 战场救护滕代远·····	61
3. “大金刚”妙手救周恩来·····	63
4. 精心安置伤病员·····	65
5. “姜太公”疗伤·····	67
6. 赖芳盛舍命救伤员·····	69
7. 艺高人胆大，志坚病魔除·····	70
8. 舍生忘死的收容队·····	71
9. 看护班小任·····	73
10. “小鬼”看护班温常声·····	74
11. 长征中的卫生员·····	75

#### 五、红医轶事篇

1. 战火催生红色卫生·····	76
2. 女英雄铸神奇·····	79
3. 中央红色看护学校·····	80
4. 巧印讲义·····	82
5. 误把吗啡当奎宁·····	83
6. 一篮鸡蛋·····	84
7. 巧借俘虏掩护伤病员·····	85
8. 师长献盐·····	86
9. “红小鬼”看护班行军记·····	88
10. 医护兵智歼残敌·····	90
11. 第一所红军卫生学校·····	92
12. 吃水不忘挖井人·····	95
13. 救治白军伤兵·····	96
14. 中医中药显神威·····	97
15. 妙法治瞌睡·····	99
16. 坚强后盾·····	101

## 前 言

自从有了人类，就有了医药的活动。在我国，早在伏羲、黄帝时期，就有了医药起源的美好传说。

在中国革命战争年代，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在“革命理想高于天”的信念激励下，始终谨记着定要人民当家做主的革命初心，不畏艰难，以自我牺牲的博大胸怀、精益求精的医疗技术和至真至爱的温情，服务军民，保障了革命胜利，建立了军民鱼水深情。他们，就是用鲜血和生命创立中国共产党早期医药卫生事业基业的红色医护人员。

红色医护人员的一言一行，充满着迷人的温情，既是发自内心的真实表达，也是人性光辉的朴实展现。千千万万个红色医护人员的点滴故事和感人壮举，铸就了伟大的红医精神。

中国共产党把保障人民健康同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事业紧紧联系在一起。1927年9月，毛泽东率领中国工农革命军进行“三湾改编”时，就专门成立了卫生队。在中央苏区，我们党开始了局部执政的伟大尝试，培养了一大批“政治坚定、技术优良”的红色医生。长征途中，红军医务人员始终“不舍弃一个伤病员”，锻造了医务人员对革命理想和事业无比忠诚的坚定信念，坚定了他们不怕牺牲、一心救护的革命宗旨，坚定了他们艰苦奋斗、大爱无言的砥砺品格。正如美国人史沫特莱在《伟大的道路》中所说：长征中“医疗队最为辛苦”。红色医护人员在党的领导下，因陋就简创建救护体系、积极开展卫生防疫、优待伤病员、医治白军伤兵……这些行动，生动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以人为本、服务民众的初心。

本书收录的红医故事，既有对革命战争年代医药卫生事业从小到大，从无到有的总体发展描绘，也有个别中药铺的“红色传奇”；既有毛泽东、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与医药卫生工作结下的奇缘，也有傅连璋、戴济民等红色名医追随革命建立伟大功勋的典故；既有极端艰难困苦条件下仍然坚持刻苦学习、勤奋钻研的人物再现，也有忠于革命，舍生忘死直到献出生命的英烈事迹……这些故事，很多是从《苏区卫生史料汇编》收录的史料改编而成的。在收集整理这些史料的过程中，红色医护人员的感人事迹以及从他们身上体现出来的伟大革命精神，就像黑夜里的灯塔，时时照亮我们前行的路，成为我们不断努力前行的动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2016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指出，长期以来，我国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弘扬“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精神，赢得了全社会赞誉。这既是红医精神在新时代的传承与弘扬，也是红医精神在当代卫生与健康工作者身上的真实写照。

激活红色基因、赓续红色传统，正日益成为人们的行动自觉。近年来，赣南医学院大力挖掘、开发和运用红色卫生文化资源，传承红色基因，弘扬红医精神，宣讲红医故事，引起了社会和部分高校的关注。本故事集的编撰，是师生共同努力参与的结果。

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尤须用好红色资源、讲好红色故事。以史为鉴，激活我们血脉中的精神力量，把精神的力量变成改变世界的行动，创造属于新时代的光辉业绩。如此，正是我们编撰本书的期盼和目的。

编 者

2018年6月

## 毛主席的医学新理念\*

毛主席有晨跑的习惯，一天清晨，阳光刚刚洒落大地，山坡上几颗翠松闪耀着一条的光亮，路边的青蛙呱呱叫着，毛泽东与傅连璋晨跑至一个山坡上，停了下来，俯瞰大地。毛主席走到松树下站住了，用手指着那松树身上的那几个亮点，颇有兴趣地说：“傅医生，你看，这胶汁是从一块伤痕上流下来的，树受了伤，用自身流出来的胶汁来医治自己；人也一样，负了伤，得了病主要靠自己的抵抗力恢复健康，是不是这样？”

傅连璋默默地想到：自己在北山上转了十几年，也常看到树上挂着这样的胶汁，只知道这是松树自己的分泌物，从来没有通过这一自然现象去联系医学问题。想到这里，傅连璋在心里对毛主席的崇敬之情油然而生。

于是傅连璋回答道：“原来是这样，增强伤病员自身抵抗力是很重要的，吃药打针只是辅助作用，所以我们总是想办法让伤病员有一定的营养和充分的休息，使他们增强抵抗力。”

不久，毛主席的这一医学新理念就得到了实际应用。

方强是红军警卫营营长，20多岁。一次作战后，他昏迷不醒被送进了医院。傅连璋亲自给他检查伤口，揭开被子一看，棉衣上渗透了鲜血。然后轻轻地解开他的棉衣，衬衣沾在胸口上，鲜血从衣缝里不住地向外流。原来，一颗子弹打进了他的前胸，又从后背钻出去，身上被打了个对穿洞。伤口离心脏只有几分远。当时他透不过气来，嘴里又吐血，伤势十分危险。傅连璋给他注射了止血药，又平定了他的呼吸。但是伤口怎么治呢？像这样的伤，过去我还没有治疗过。我突然想到了在汀州北山散步时，毛主席讲的关于松树流胶汁的事。我耳边响起了几个月前毛主席说的话：“……有了伤，有了病，主要靠自己的抵抗力恢复健康……”于是有了办法，给方强同志的伤口消了毒，上了药和敷料，防止感染，又给他打了止血针，同时采用半卧位静养，充分增加他的营养，使他增强抵抗力，派董廖湘护士昼夜照顾他。只经过了一个多月，方强同志的伤口就长好了。

（郭良整理）

---

\*本文根据《中央红色医院的成立》一文改编，原载傅连璋著《在毛主席教导下》，作家出版社1959年版

## 总司令让房\*

天色已晚，火把点出的光照着泥泞的小路。经过一天的行军，大家已经疲惫不堪。找个房子住一晚，打个地铺，铺上稻草，睡上一觉，那是多美的事情呀。让人可气的是，老天竟然故意与我们作对，竟然下起了滂沱大雨，惹得我们这些红军卫生学校的学生们心烦意乱，不时埋怨这鬼天气。

游胜华和一个同学背着背包，摸黑赶进了一个村子。他俩是奉命打前站，给刚从战火前线转移过来的学校师生号房子的。谁知四下一打听，村子里已经住满了部队。于是他们两个人分开行动，游胜华先赶到前边三里外的一个村子去号房子，那个同学留在村口迎候学校的大队。正当两人分头行动时，忽然听到一声高喊：“喂，你们两个怎么在树下避雨呀？小心招雷劈！”寻声望去，只见一盏马灯在不远处一闪一闪，模模糊糊的看见两个人朝这边走来。那声音听着挺耳熟，可一时间却又想不起那是谁。

“好像是总司令。”那个同学小声对游胜华说。

“还不快离开！”又是一声急促的叫喊。

“真的是总司令，我也听出来了。”说罢，游胜华激动地拉着那个同学快步跑上前去。

在那一盏摇曳的火光下，只见朱总司令戴着斗笠，灰布军装被雨水打湿了一片，身旁提马灯的像是他的警卫员。看见总司令，游胜华他们上前敬了礼。总司令用责怪的口气说：“雷雨天跑到树下可不是耍子哟。”他们不好意思地朝着总司令笑了。

“还笑哩，背包都打湿了。你们两个是哪个单位的，怎么还没住下？”

他们不愿意耽搁总司令的时间，便简短的把遇到的情况说了说。总司令听罢，背着手在泥泞的地上踱起步来。不一会儿，他抬起头，问道：“你们有多少人？”

“连伤员一共六十多个。”

“怎么，还带着伤员？”总司令站住了。他们两个点了点头，心里面感到很不安，暗自责怪不该为这点小事麻烦总司令。“这样好了，你们就住到村子东边的高台子上去。看，就在那里。”总司令指着雨雾中朦胧可见的一片灯光说“那个大院里住上六、七十人不成问题。”

“那儿已经住上部队了。”

“他们可以住到别处去嘛，伤员要紧。”

---

\*本文根据游胜华《在人民军医的摇篮里——朱总司令给我们号房子》一文改编，原载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部队后勤部政治部编《为了红色中华》，中国青年出版社1984年版。



“那……”

“好嘞，就这样定好了。”总司令不容他们再说什么，跟游胜华握了握手，又给那个同学正了正军帽，亲切地说：“去迎接你们的人吧，我正好去那里，房子我给你们号下，再见了小鬼头。”说完，总司令便带着警卫员走了。

游胜华和那个同学最终把学校的队伍迎进了村子，在朱总司令的号好的房子里住了下来。安顿好伤员后，班里的同学们一边围着火盆烤湿衣服，一边听游胜华介绍遇见总司令的经过。游胜华正绘声绘色地讲着，不料外面跑来一个人，细看原来是和他一块号房子的同学，说贺诚校长叫他们去一趟。一路上游胜华不停地问到底出了什么事，那个同学说他也不知道，只是贺诚校长传唤他的时候脸色不太好看。一路上游胜华的内心忐忑起来“不会出什么事了吧！”

“你们可真行啊！”刚进屋贺诚校长便劈头给了我们一句。见校长脸色严肃，他俩相对望了望，都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

“你们知道这房子是怎么来的？”

“朱总司令给号的呀。”

“就为了这才叫你们来！”

“其实我们那晚不该麻烦总司令的。”那个同学小声的和游胜华嘀咕。

“何止麻烦哟，你们把总司令和首长们都挤跑喽！”

游胜华顿时愣住了，真没想到他们竟占了总司令和首长们的住房！怨不得校长生气呢。他俩心生内疚，都低下了头。谁知贺校长却扑哧一声笑了，竟给他们一人手里塞了一块红薯，用嗔怪的口气说：“你们呀，挺机灵的小伙子，竟办蠢事。总司令和首长们是要指挥千军万马呀！要是给冻病了，我可是要找你们算账的！好了，你们回去休息吧！”游胜华挠了挠头，辞别了贺诚校长，拉着那位同学跑了出去。

外面的雨比原来小了许多，但风却是刺骨的冷，吹在身上让人直打哆嗦。当游胜华跑回班里时，已经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当他重新回到火盆前，躺在又干又软的稻草堆上时，身上才渐渐暖和了起来。然而，他却怎么也睡不着，眼前总是会浮现那盏在雨夜中熠熠发亮的马灯。真不晓得这么冷的天，总司令会不会冻病，他这会儿是不是住下了呢……

(胡家浩整理)

[illegible]

**游胜华**（1912—1996），江西省万安县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一军团卫生部医生，军团司令部卫生所医生，军团医院医务科科长，后方医院第二所所长，第一师三团卫生所所长，红一军团卫生部医务科科长。参加了长征。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后勤部副部长兼卫生部部长、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预防局局长、湖南医学院院长、北京军区后勤部副部长等职。

## 朱德当“医官”\*

一件小事，万人传诵；一颗暖心，世人触动。

他是军长，率领千军万马奋勇杀敌，他爱兵，爱他的兵，他就是我们的军长——朱德。朱德爱兵，在井冈山时期就有名了。

1928年6月中旬，蒋介石命令湘赣两省的反动派联合“会剿”井冈山，扬言要消灭红军，拔除据点。赣敌杨池生、杨如轩两个师共五个团的兵力，首先向驻扎在井冈山上的红军进犯。为了保卫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毛委员和朱军长亲自部署指挥了七溪岭战争。战争在6月23日清晨打响，经过一天的激战，红军歼灭了敌人一个团，击溃敌人两个团，最终成功粉碎了敌人的“梦想”。

就在这次战斗结束，部队将要撤离战场时，朱军长发现红二十九团有个负伤的战士，伤口还没来得及包扎，走路一拐一拐的，他赶忙走上前去，关切地问：“伤到哪里了？伤势重不重？”

这位战士抬头一看，是朱军长，顿时觉得很温暖，赶忙说：“没关系的，只是腿上擦破一点皮。”

“让我看一看。”说着，朱军长亲自扶着这位战士走到一块石板前，慢慢地让他坐下，然后自己蹲下来仔细查看伤势。他在那一动不动地凝视着那血迹未干的伤口，在他的眼神里，可以看出当时朱军长心里是有多么的难受。这个战士看出军长为自己难过的样子，连声说：“我这伤不要紧的，不要紧。”

朱军长说：“虽然没有伤着骨头，但伤势也不算轻，现在天气热，不及时包扎，就可能引起伤口发炎，马虎不得呀！你在这休息一下，我一会就回来。”

说完，他就朝一个小山坡走去，边走边看，边看边找，时而摘下几片叶子闻一闻，时而拔下几棵小草嚼一嚼，原来他正在为这位战士采药呢。过了一个时辰，朱军长拿着一把草药，脸上露出高兴的神色回到这个战士眼前。他把草药放在嘴里嚼烂，亲自给他敷上。

这位坚强的战士哭了，哭了。当敌人的子弹穿过皮肉时，没掉一滴泪，可在朱军长的关怀体贴下，却忍不住热泪盈眶。他紧紧握着朱军长的手说：“您又当军长又当‘医官’，当军长带领我们打仗，当医官为我这普通战士治病，真是让我一辈子也忘不了啊！”朱军长用爱抚的口气解释说：“我们革命队伍里的同志都是阶级兄弟，应该互相关心的嘛！”

（杨子帆整理）

---

\*本文根据赖春风《又当军长又当“医官”》一文改编，原载徐向前、粟裕等著《星火燎原》（第十一卷），解放出版社2009年版。

## 陈毅激励伤病员\*

中央红军长征以后，江西根据地在中央红军退出三个半月以后，全部被疯狂进攻的敌人侵占了。项英同志、陈毅同志、贺昌同志率众退至于都、安远、会昌交界的仁凤山地区。气焰嚣张的敌人把狭小的仁凤山团团围住，妄图一口气吃掉这支陷入严重困境的红军队伍。仁凤山区周围，东西南北到处响枪，包围圈步步紧缩，在这生死关头，根据陈毅同志的意见，部队决定分九路突围……

突围时间选在半夜。部队刚出发，倾盆大雨便下来了，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战士们走一步，跌一跤，开始还在路上走，后来路也没了。走到八点钟，一问，两个钟头才走了五里路。陈毅同志在第五次反“围剿”的兴国老营盘战斗中，大腿坐骨受重伤，这时候伤口并未全好，拄个拐杖走在队伍前面，也是一步一滑，一步一摔，摔倒在地的时候多，走的时候少。情况危急关头，陈毅等赶到了一个医院。

这家医院位于山高林密的山沟沟里，收容了二三千个伤员。陈毅在这医院对伤员讲了一次话。当时，陈毅自己也负了伤，拄着损杖，一跛一跛的。伤员便默默地听着，没有人骂。陈毅动员说：“江西根据地的失败，不等于中国革命的失败，中国革命是一定会成功的。我们的主力红军并没有被消灭。在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下，我们的主力红军一定会战胜敌人。敌人的内部矛盾很多，敌人的矛盾是无法克服的。三五年后，只要红军还在，革命的火种不灭，革命的高潮一定还会到来。现在是紧急关头，是最险恶的时候，同志们千万珍重，千万珍重，珍重自己，珍重革命的事业。做胜利时英雄容易，做失败时英雄不易，革命的路靠自己走，同志们要有做失败英雄的勇气。万一不幸，不要拉扯，牺牲只能牺牲一个，只要有的同志还活着，同志们将来定会替我们报仇的。”

陈毅的话，像是拨火棍，伤员们听着听着，心里的炭盆又被重新点燃。有人喊：“只要告诉我们就行。”有人喊：“中国革命有希望，我们自己就有办法。”有人讲了一句怪话，立即遭到斥责，几个人同时喊：“不要讲了，大敌当前，怎么讲这个话！”十五年后，当陈毅同志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时，还仿佛清晰地听到了这种英雄的最强音。只有最坚强的革命战士，在面临如此严重威胁的时候，才会有这种最坚强的英雄气魄。

(王友文 李壮壮整理)

[illegible]

项英(1898-1941),湖北武昌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代理书记兼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军委副主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副主席、中共苏区中央分局书记、中央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军委分会主席等职。

\*本文根据宋之的《难忘的三年——记陈毅同志的谈话》一文改编，原载宋之的等著《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 彭德怀巧用火炉治病\*

1927年12月的一天，大雪飞扬。彭德怀在宜春、萍乡、莲花打土豪分田地后，为了扩大红军根据地，他带领部队前往安福，驻扎在钱山乡钱洲村暂时休养，顺便避一避这场大雪。

部队安顿后，彭德怀住在一家姓贺的两兄弟家。贺家两兄弟自幼失去父母，由爷爷抚养长大；后来爷爷去世了，留给他们两间宽敞的屋子。贺家两兄弟的名字有点女性化，哥哥叫贺兰梅，弟弟叫贺寒梅。哥哥长得生龙活虎，弟弟却是个药罐子，病怏怏的，还“打摆子”。这种病怕冷，还咳嗽得厉害。加上这下雪天的，屋子里也没火炉，炉灶也不生火，贺寒梅就在床上咳嗽着。咳嗽声越来越重了，惊动了在隔壁办公的彭军长。他还以为是贺寒梅不小心着凉了，才咳嗽得那么厉害，也没在意，只是叫警卫员请军医给贺老弟看看。军医过来给他把把脉，抓了几副草药。可是，草药下肚后，几天下来，彭德怀还是听到咳嗽声。彭军长以为军医不尽责，立马让军医来见他。

军医一来，彭德怀开门见山就问道：“你不是给贺老弟看了病，开了药，怎么还不见好？平时的疑难杂症都不在你话下，可今儿，贺老弟不就是一点点风寒，你就拿它没办法啊？”

军医忙解释：“军长，您可错怪我了，贺老弟患的可不是小风寒啊，这病是小时候就落下的病根，恐怕一时半会不会好，几副草药也顶不了多大用处。”

“那可怎么办？”彭德怀急忙问道。

军医连忙说：“只要贺老弟能够时刻保温，比如用一个火炉，上面生火，让他经常烤火，说不定能够把他体内的虚寒赶走。”

听到火炉，彭德怀眼睛一亮，自己房间正好有个火炉，那时在莲花打土豪分田地时收缴了一批东西，其中就有这个精致的铜火炉。

想到这，他起身走到他床边，弯腰取出在床底安放着的被包得严严实实的铜火炉，就要送给贺寒梅。

军医和警卫员见状，急忙阻拦，异口同声地说：“军长，这万万不可，这是部队缴获的物品，这冰天雪地的，您也需要这火炉，冻坏您了，我向谁交代去？革命需要您健

---

\* 本文选自《井冈山的红色传说》（三），张泰成主编，江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康的身体。”

警卫员还想说几句，就被军长的话打断了。

“你们都别说了，救命要紧，这事就这么定了。”彭德怀说。

彭德怀来到贺寒梅房间，贺寒梅大概是因为咳累了，就睡着了。见此，彭德怀为了不打搅他，就悄悄烧起火来。等火炉的火烧旺了，站起身来要走。正当军长转身要走时，贺老弟被一股暖气流暖醒了，转头发现军长，急忙爬起来，准备下床。彭德怀见状，马上过来阻拦。

“贺老弟，你别下床，好好休息。”彭德怀说。

这时贺寒梅才发现屋子多了一个火炉，而且还是个铜的。心里已然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可是，军长，你把这个给我了，你拿什么烤火啊？”

“贺老弟，你也别推辞，这是给你治病的，听军医说，经常烤火对你的病有缓解作用。我们来个约定，等你治好了病，我再来拿，好吗？”还没等贺寒梅说话，彭德怀接着说，“就这么定了。”说完转身就走。

住在贺家不到两三个晚上，由于得到消息，部队急需转移，彭德怀没来得及与贺家兄弟告别，匆匆离开了钱山乡钱洲村。

红军走后不久，贺寒梅的病在火炉的帮助下，慢慢地好转了。更为稀奇的是，贺寒梅从此以后再也不打摆子了。

1969年，井冈山博物馆成立时，文物征集人员来到安福县钱洲村调查，才发现贺家这铜火炉，彭德怀送火炉的故事才被人们知晓。那时贺寒梅还健在，由于一直盼着军长回来拿回铜火炉，所以完好无损的保存着。当贺寒梅听完文物征集人员的来意之后，毫不含糊的将铜火炉送给他们，口中喃喃地说道：“军长，您终于派人来拿铜火炉了。”

现在，这个精致的铜火炉仍旧陈列在井冈山博物馆的玻璃柜里。

(马小美、常胜收集整理)

## 周篮智救陈毅\*

周篮，是一名秘密的女交通员，她在游击战争时期，可是一位出了名的女英雄呢！游击队员们都亲切的叫她周篮嫂。周篮的家，在广东和江西两省交界的地方，也就是大庾县池江的彭坑。她家往南可到广东南雄的大兰，平田坳；往东，可到信丰油山的黄坑口；往北经小汾，弓里出坑，可到大庾池江圩。这个地方树林茂密繁盛，坑多隐蔽，很适合游击队活动，因此也是当时的游击根据地。陈毅同志就经常到彭坑小汾一带开展工作，经常在周篮家落脚。

那是周篮和陈毅的第一次见面，陈丕显陪同身材高大的陈毅到周篮家里，对周篮说：“这位同志过去作战时，腿部负了伤，现在旧伤复发，你看能不能找些药医治伤口。”当时周篮还不知道他就是陈毅同志，但听到大家都叫他老刘，并且看到，他旁边有一个挎驳壳枪的小鬼跟着，心里就猜测，这肯定不是一般人，他一定是游击队的一个大官。

这年，由于国民党军的频繁“清剿”、“封山”和“并村”，山里游击队的给养极度困难。为了安全起见，他们在屋背岭的松树下面搭了一个草棚。白天到周篮家来换药；晚上，回棚子里住。那时国民党军封锁山区，在坑口的弓里村扎了军队。进坑出坑的人都要盘查，很难到外面买到什么好药，没办法了，周篮只能用采草药的土办法给陈毅同志治疗。每天，周篮从田坝上拔回一些辣蓼草，狗贴耳等草药，然后将辣蓼草加点盐放到锅里煮，煮出药味后就用水桶舀起，然后请陈毅过来洗伤口，并用围裙遮住桶面，让那药水的热气熏伤口。然后把狗贴耳和从田埂上挖回的蚂蚁窝一起捣烂，制成药饼，贴敷在伤口上，再用布条捆扎好。由于加了盐，洗的时候药水渗入伤口是很痛的，每次给陈毅熏洗一次，就痛得他冒一身的汗。但是陈毅却紧紧的咬住牙关，还尽力地挤出微笑，给周篮鼓励说：“大嫂，不怕，尽管洗得去！”经过反复的熏洗，红肿的伤口竟然慢慢的好了起来。陈毅激动的对周篮说：“大嫂，真没想到你还有这一手绝活，你用的是什么灵丹妙药呀！”听了这话，周篮嫂就领着他到屋外的田埂路上，指着路边那些长着的辣蓼草和狗贴耳，对他说：“你看，就是这些灵丹妙药治好了你的腿呢！”

在陈毅养伤期间，国民党军不时地进坑来“进剿”，为了保障陈毅的安全，周篮时刻都警惕地注视着周围的一切动静。

---

\*本文根据周篮《陈毅同志在我家》一文改编，原载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赣粤边游击区》，解放军出版社 1991 年版。

一天傍晚，陈毅坐在屋后的一棵梧桐树下看书，警卫员小聿牯在旁边擦枪。此时周篮在房前圳沟里洗衣服，突然发现一群国民党兵已经快到家门口了，情况万分危急，怎么办呢？回到家去通知，已经来不及了。周篮见房前的一只猪，她急中生智，用石头打猪，边打边大声叱骂：“你这只瘟猪仔，还不赶快回家，这么多兵来了，会把你打死的。”陈毅等听了，连忙转移到深山里去了。国民党兵搜查了周篮的家，什么也没捞着，就溜走了。晚上陈毅回来对周篮说：“哈哈，周篮嫂，你真有法子啰！当得一个诸葛亮哟！”周篮嫂也开玩笑的对他说：“我有什么法子呀，还不是你的时运好！”说的陈毅也哈哈大笑起来了。

[illegible]

周篮（1904-1975），小名三娣，赣南游击战争时期秘密交通员。

## 南昌起义的第一批巾帼英雄\*

南昌起义部队南下广东，转战潮汕。在南下的部队中有三十名女兵，担任着南下部队的救护工作。在艰苦的长途行军中，没有一个累倒和掉队的，始终为伤病员服务着。

会昌战斗打响了，女兵当中像杨庆兰、谭勤先等几个身体壮实的女兵，被分配到前线抢救伤员，大部分女兵都分配在临时医院担任救护伤员的工作。

从前线抢救下来的伤员很多，女兵们遇到的困难也不少。单是床铺的需求就伤透了脑筋，没办法，只好在村庄里动员群众拆下门板，架起临时铺位，才得以解决伤病员的病床问题。

因为战斗残酷，伤员的伤势都很重，有的头部中了子弹，有的腰部受了重伤，还有的被打断了手臂，或打折了腿。当时，医院的设备条件十分简陋，药品不够，医务人员几乎没有，女兵们虽然沿途学会了一些简易的医疗常识和包扎方法，但对重伤员却无能为力。本来有些伤员需要及时开刀将子弹或弹片取出，才有好转的可能，但事实上却办不到，她们只好每天给伤病员换换药，减轻伤口腐烂的程度。再加上那里天气炎热，一些伤员又染上了流行病，她们的护理工作就更紧张了，简直是不分昼夜。有时忙起来，她们只能在病床前面偶尔瞌睡一小会儿。就这样女兵在瑞金城内住了一星期。

9月中旬的一天，天刚放亮，应部队要求，女兵陪同一些轻伤员步行，沿着河岸向汀州出发。行军两天，进了汀州城后，院长傅连暉把全部伤员都安排在福音医院里护理、治疗。看到伤员们有良好的治疗条件，女兵们的心如同一块石头落地。

9月23日，我军占领潮州。24日，先头部队已到达汕头。25日下午，敌军反攻潮州，女兵中当时在潮州工作的胡毓秀，王鸣皋，谭勤先和部队失去了联系。随后一位工友为了保护她们的安全，让她们在红十字会医院的厕所里潜藏了整整一个星期，每天有专门的人给她们送来两顿糙米饭，这种难熬而痛苦的日子正是共产党人需要经历的考验。

到了第八天，那位工友带她们去见了医院的一名医生。他跟她们谈了一些外面的情况，安慰了她们一番。医生的太太还自告奋勇给这三名女兵裁了三套便衣。

三天以后，医生又对她们说：“这个医院收容的都是作战双方的伤员，其中大部分

---

\* 本文根据胡毓秀《南昌起义的第一批女兵》一文改编，原载徐向前，栗裕著《星火燎原》未刊稿（第一集），解放军出版社2009年版。



她们用苦笑回答了伤员同志的问话，连忙向他点头示意，就在这一刹那，见到同志那种激动之情，难免热泪盈眶。从这天开始，她们细心地看护着自己的伤员同志。后来，她们进一步得到红十字会的帮助，从潮州到汕头，登上了开往上海的轮船。

[illegible]

13

## 张汝光学医\*

1931年的一天，军医处医生孟谦找到张汝光，笑着说：“小张，组织上决定派你去红军卫生学校学习哩！”张汝光又惊又喜，虽然自己很渴望学医，像孟医生一样治病救人，但是却又想：“红军天天行军打仗，流动性极强，怎么能建立学校呢？大概是孟医生跟自己开玩笑吧。”孟医生又接着说：“没跟你开玩笑呢，红军已经扩大到五、六个军了，但卫生人员相对又很少了，我们军医务处只有三个医生，一打仗就忙不过来，有些伤口就靠贴膏药来治，眼看伤员得不到及时治疗而痛苦，不培训医生怎么行呢！你就好好准备吧”。后来军医处的政委亲自向张汝光传达了组织的决定，证实了孟医生的话。张汝光兴奋得好几个晚上没睡着。

要成为红军军医学校的学员并不容易，1932年1月5日，张汝光和师里其他几个被推荐的战友一起到瑞金的总军医处报到，不久都参加了入学考试。参加考试的一共150多人，年龄16岁到30岁不等，其中有10个女同志。

张汝光顺利的通过了考试，成为红军军医学校的正式学员。入学第一课是教育长陈志方同志上的拉丁语，这是一门不好读不好写却是很新鲜的课，大家都很有趣，但是因为缺乏“A、B、C、D……”的基础，张汝光和其他同学只能死磕这门课程，从那天起，无论在吃饭的时候，还是课后休息的时候，总能听见大家生硬的拉丁文朗读声。

在红军军医学校学习期间，张汝光对两件事印象最深刻。

水口战役结束后，部队在新丰成立了临时医院，先后接收了一千多名伤员。彭真是院长，也是唯一的医生。彭真把军医学校的学员们十几个人分成两组，一组负责轻伤员的治疗和后转，张汝光所在的一组给他当助手进行手术。因任务急迫，彭真现场简单地给大家讲解了怎样消毒、麻醉、传递器械后，大家就开始手术工作了。有一次，张汝光给一个伤员麻醉得太多，以致呼吸微弱，彭真镇静的停下手术，进行急救，耐心的告诉张汝光应该怎样做，语气里没有一点责备的意思。但张汝光自己觉得很羞愧，自此小心翼翼，还有一次在为一个伤员麻醉时，因为麻醉得不够，以致手术进行时伤员动了起来，这时，彭真又停下来指导麻醉。张汝光懊恼极了，但同时也下定决心，一定要更努力的学习。

---

\*本文根据张汝光《在红军卫生学校第一期》一文改编，原载《人民军医》，1961年第6期。

在红军军医学校茶岭复课后，彭真担任校长，他先后留学日本和苏联，但是艰苦朴素、和蔼谦虚，看不到一点洋气和傲气。任校长后，彭真依旧给大家上课，遇到难以理解的内容，总是反复地用不同的方式给大家讲解，直到大家明白为止。彭真经常利用晚上的时间给学员们编写讲义，有空的时候也给学员们讲苏联十月革命和五年计划的故事。他经常提醒大家要努力学习。有一次他说：“你们是第一期，是后继者的榜样。在这样的条件下，党和政府建立学校来培养你们很不容易，你们在校时应该知道出校后责任的重大！”

(臧传孝整理)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南军区后勤部卫生部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部长、总后勤部副部长兼卫生部部长等职。

## 吴行敏艰辛求医\*

1933年，红军卫生学校开始招收第六期学员，吴行敏当时在红五军团三十九团卫生队药房担任见习调剂员，因政治表现好，工作认真负责而受到组织的信任，并被推荐报考红军卫生学校。

五军团卫生部把各团送来的学员编了班，要进行初试。初试中，吴行敏闹了笑话。来自军团卫生部的姬鹏飞担任政治课主考官，当时有这样一道题：“是敌人‘围剿’我们呢？还是我们‘围剿’敌人？”吴行敏半天答不上来。心想：如果说敌人“围剿”我们多不好。思考许久，最后他壮着胆子回答：“我们‘围剿’敌人！”现场的考官考生都被逗得笑了起来，吴行敏的脸都红了。姬鹏飞同志当场纠正他的答案，和蔼地说：“是敌人‘围剿’我们，而我们对敌人进行反‘围剿’。”

经过审查和考试，最终军团卫生部挑选出了十几位较优秀的同志，五月份前往江西瑞金卫校报考，吴行敏也在报考之列。

这期考生有七百多人。招生处把先到的考生编入连队，组织学习。每天除政治学习、军事操练外，重点是文化补习。一个多月后，各地考生先后到达，中国工农红军卫生学校招生考试随之开始。

就在吴行敏对瑞金苏区的一切都渐渐适应并对未来充满信心和希望时，一场重病悄然而至。那时，政治课刚刚考完，吴行敏突然发烧了，几天不退，什么药也不灵。第七天，医生发现他身上出现水痘般的假天花，这种病传染力很强，校方立即把他送到洋江下村附属医院传染科天花病房隔离治疗。正在考试的关键时刻，突然得急病，吴行敏万分心急。在隔离病房内，他感觉就像坐牢一样苦闷，常常夜里闷着被窝哭泣。当时附属医院条件差，十几个天花患者，不管轻重都住在一间大屋里，常有重病号死亡。病情稍微好转后，吴行敏立即请求出院，而医院坚持要他身上的痘痂脱落后才能出院。因此，他又要求把考题拿到病房让其作答，院方仍不同意，只能作罢。

在他病愈出院的第二天，正好考生发榜。大伙在操场列队点名，七百多人，却没有他的名字。招生处的同志说：“这个小鬼什么名字？为什么没参加考试？没考试就回原单位。”一听到这个消息，吴行敏就哭了。其原带队的廖明亮同志，替他向校方说明情

---

\*本文根据吴行敏《在红军卫生学校的日子》一文改编，原载赣南师范学院、江西教育科学研究所编《江西苏区教育资料汇编（1927-1937）》（三），1985年版。

况。校方说，“既是这样，这小鬼太小，到调剂班学习吧。”廖同志又找陈义厚校长，详细说明他原已是见习调剂员，有点文化，个儿虽小学习很勤奋，校长就决定让他到第八期预科班学习。

吴行敏艰难的求学历程使他倍加珍惜在红军卫生学校学习的机会，在第八期预科班学习的日子里，他克服重重困难、刻苦学习，半年后，同班上 60 多名学员一起转入第八期本科学习。

(王丹整理)

[illegible]

吴行敏(1917—1994)，福建省南靖县龙山涌北许溪人，1917年出生在印度尼西亚国，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6年由共青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一方面军红五军团43师看护员，37师卫生队调剂员，1933年入红军卫生学校学习二年，后任红五军团39团2营医助，红四方面军独立师卫生队医生、队长。参加了长征。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东北工业部卫生处长、中燃部煤矿局卫生处长、北京中央人民医院副院长、北京中苏友谊医院副院长等职。

## “红色华佗”戴济民\*

1930年10月4日，毛泽东、朱德等领导的红一军团，在当地群众的大力支援下，第九次攻打吉安城，终于取得了成功。但由于作战规模扩大，人员伤亡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惨重。战后，部队把各此战役的1000多名伤病员全都集中到了吉安青原区静居寺，医疗救护工作顿时十分繁重。这时，红军急需寻找具有高超医疗技术的医务人员和稳定的后方医院。

红军将领罗炳辉得知故友戴济民在吉安开诊所，心中窃喜，他立马把这个消息报告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听后大喜，表示要去登门拜访，嘱咐罗炳辉与戴济民取得联系。在红军攻占吉安城的第二天清晨，他就来到戴济民家中，告诉他中午红一军团的首长要登门拜访。戴济民一听高兴极了，立即吩咐妻子准备丰盛的午宴款待贵客。当天中午，毛泽东、朱德、总前委秘书长古柏、谭震林、孙宗逊、杨志诚等，由罗炳辉引路，来到了戴济民家中。蓄着大胡子的戴济民亲自到大门口迎接。在罗炳辉的介绍下，戴济民激动地与毛泽东紧紧握手。

“共产党为工农谋利益，红军实为威武严明之师！我敬各位一杯！”戴济民站起来首先举杯一饮而尽。

毛泽东站起来说：“一向秉承着博爱和人道主义的戴济民同志就是在这种情形下加入的红军，我不善饮，戴医生如此盛情，这杯酒我一定喝完。炳辉同志既是军中英雄，也是酒中豪杰。你与古柏多敬戴医生几杯！”说完也举杯一饮而尽。席间，大家谈笑风生，其乐融洽。

毛泽东得知戴济民医术高超，为人正派，在吉安城中很有名望。亲切地对戴济民说：“戴医生，我们有位周同志(周以栗，时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军事部长)可能患有肺病，我们部队缺少医生，能否请您帮忙看看？”

戴医生捋捋胡子，说：“救死扶伤，本是我们医界的天职，我一定尽全力诊治！”他顿了顿，关切地说：“红军天天打仗，伤病员肯定很多，你们也应该多配一些医生，多办些医院才好。”

“是呀，我们也想多办些医院，但是找不到医生，尤其是像你一样医术高明的医生

---

\*本文根据戴济民《红色一分院的确立》一文整理，原载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后勤工作·史料回忆》（1），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



## 李治二三事\*

### 一篮鸡蛋

长征结束后，李治突然病倒了，连续发高烧，昏睡了好几天。经过治疗，高烧退了，吃饭时，李治发现每顿都有鸡蛋，觉得很奇怪，就问身边照顾他的人：“哪里来这么多鸡蛋？”那人回答：“是毛主席派人送来的。他得知您病得厉害，心里着急您的病情，还亲自来看过您呢，只是当时您正处在昏迷状态，并不知情。”那人一边东西，一边回答，“毛主席还特别指示了，要好好地对您进行治疗，就派人送来了一篮鸡蛋。呐，您看，毛主席还亲自写了字条：李治同志不能死。”

### 一把胡子

李治与周恩来之间的友谊在革命中越来越坚定，他们也会像平常的朋友一样开玩笑。周恩来同志经常留着长胡子。一次，李治同周恩来闲谈中说起了他的胡子。李治用手拉了拉他的胡子说：“胡子这么长也不刮。”周恩来半开玩笑地说：“别揪，别揪，要是揪掉了怎么叫我周胡子呢？我这胡子要等到革命成功才刮光。”可是，不久后，李治再见到周恩来时，他的胡子已经刮掉了。李治开玩笑的问他：“记得之前你还说要等到革命成功才刮掉，为何中国还未解放就刮掉了呢？”周恩来笑笑说：“不能等革命成功喽，你这个保健科科长不是有要求吗？要讲卫生嘛”。说完两人都哈哈大笑起来。

### 一支枪

1947年7月至12月，李治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卫生署署长期间，培养出来的医务人员在部队日常卫生工作和战场救护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军人强马壮，接连打了许多漂亮的胜仗。西北大捷后，贺龙对卫生工作非常满意，特意过来看望李治。他高兴地对李治说：“医生护士救了这么多伤员，我可真要好好谢谢你啊。咱们能胜利，自然也有你们的一份功劳。”他拿过警卫员背着的一支枪交给李治，说：“这是我特意拿来送你的，是战场上缴获的，已经修理得好好的，送给你，给你打猎用。”这把枪是一支很漂亮的七九式“汉阳造”，李治很高兴，要留贺老总吃饭。贺老总一听李治如此高兴，爽朗回道：“请我吃饭？那我可不会客气。”

---

\*本文根据冯彩章、李葆定《中央苏区四大名医：李治》一文改编，原载冯彩章、李葆定《红医将领》，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年版。



## 一顿教训

彭德怀骂人似乎很出名。李治在彭德怀身边工作的一年多时间里，也挨过他的骂。有一天，李治觉得彭德怀总这样骂人非常的不合适，于是针对他骂人的口头语，尖锐地向他提出规劝，“革命时期，大家可个个都是热血好儿郎，你这逮谁骂谁的习惯，可是会让我们很伤心难堪呀。”彭德怀一听，顿时显出孩子般的懊悔的神色：“我这脾气不好，老也改不了。”在一年多时间里，李治更深切地体察到的是彭德怀豪放热情的大将风度。后来有一次，李治因为工作劳累病倒了，彭德怀特别关心他的健康，亲切地对他说：“你的病短期治不好，这里条件不好，我决定让你去北京治病。”他还深情地说：“等打完仗，我去北京看你。”

（张雯慧整理）

## 何复生魂留苏区\*

1934年4月，红三军团参加广昌保卫战，以后又连续参加阻击敌人南下的多次战斗。其中以8月间的高虎脑、万年亭战斗最为激烈。高虎脑、万年亭在中央苏区广昌、石城一线。这一带群山连绵，地势险要。敌人以重兵向南侵袭，采用堡垒战术，层层设碉堡，并配有飞机、大炮。红军也构筑了坚固的坑道工程，以阻止敌人的进袭。

当时，何复生率卫生部在万年亭、石城间的小松镇救治伤病员。由于战斗激烈，持续时间长，伤病员很多，加上天热，卫生部工作压力十分巨大。在这种情况下，何复生把卫生部的医生、看护共20多人分为两个班，组成两个医疗所，一个收伤员，一个收病员，重伤员则转往于都等地的后方医院。由于组织得好，运输线畅通，卫生部完成收、治、转几道程序只需几小时，共收治伤病员3000多名。何复生以身作则，带领大家为伤病员包扎、换药、检查、开刀、服药、打针、喂饭给水、端屎倒尿、消毒洗衣，昼夜不停地工作，使许多伤病员感动得热泪盈眶。

高虎脑战斗激烈进行时，总指挥彭德怀在前线派通信员送信给何复生，说前沿阵地上打死了很多敌人，尸体腐烂，臭气熏天，希望卫生部派人去协助打扫战场。何复生看完信，立即率领看护和通信员等30余人，急行军半天，赶到前沿阵地，协助部队用两天半时间，掩埋尸体，打扫坑道，使工事内的卫生状况大为改善。与此同时，他还亲自看望、处理尚未后送的伤病员，亲切慰问指战员。

8月14日凌晨，敌一个师在飞机大炮掩护下，向红军阵地发起了猛攻。红军英勇抗击，战斗十分激烈。早饭后，何复生牵挂前线的救护后送工作，怎么也安不下心来，要上前线指挥所。当时卫生部政委刘惠农说：“这次该我去了。这里伤病员那么多，要治疗，离不开你。”但何复生坚持要自己去，说：“前线部队伤病员很多，医疗救护工作任务繁重，有许多问题需要研究改进，我得去看看。”

何复生到了万年亭的前线指挥所。彭德怀一见他，就批评说：“这里不是你的位置，赶快回去治疗伤病员！”何复生在指挥所观察、了解战斗和伤员救治情况后，准备回来，但偏偏此时疟疾突然发作，他浑身发抖，在坑道掩体里呆不住，就到坑道外晒太阳取暖。忽然一架敌机袭来，彭德怀连忙出去叫何复生进坑道。何复生一心想着首长安全，坚持

---

\*本文根据巫仰光《高虎脑战斗的救护工作》一文改编，原载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编《创业维艰——回忆红军时期的卫生工作》，人民军医出版社1983年版。

让彭德怀先进。就在这时，敌机突然俯冲扫射，他身中数弹，当即倒在血泊之中。

何复生被送回小松镇卫生部。医生迅速进行检查，只见头、胸、上肢多处负伤，心跳、呼吸已经停止。同志们无不悲痛万分。

何复生牺牲后，广大红军指战员都十分悲痛，后悔没有坚决要他迅速离开阵地回卫生部。特别是彭德怀同志，他流着泪连声说：“早一点走就好了，早一点走就好了。唉！”“何复生是为掩护我而牺牲的。”

何复生同志对红三军团卫生工作多有建树，在救治红军和提高红军战斗力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的牺牲是红三军团的巨大损失。何复生的遗体埋葬在小松镇附近的一座小山坡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山上的青松郁郁葱葱，长伴着忠魂巍然挺立。风起涛涌时，好像在娓娓讲述着烈士的英雄事迹……

(李喬斌整理)

[illegible]

何复生 ( 1902-1934 )，江苏镇江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先后担任总医院院长、卫生部部长。

## 红医陈义厚\*

陈义厚，字慈仁，汉族，山东武城人，中国共产党党员，毕业于北京医科大学，留学日本，编写过《药理学》、《处方学》和《创伤治疗手册》，创办了《红色卫生》杂志，曾任西北军孙连仲部的军医处处长，参加革命前，在医学和医学教育方面已颇有名气。

1931年12月，国民党二十六路军宁都暴动成功，红五军团成立，下辖十三、十四、十五军。陈义厚由原七十三旅军医处处长改任由该旅为主整编的十三军卫生部部长，后任五军团卫生部部长。1933年春，他率领红五军团卫生部的全体指战员参加了第四次反“围剿”的战场救护工作，组成了从绷带所——野战医院——兵站医院——后方医院——总医院的关联性救护体系，为及时抢救伤员做出了重大贡献。在任红五军团卫生部长期间，他坚决贯彻总卫生部提出的“一切为了伤病员，一切为了红军战士的健康”和“预防第一”的方针，在红五军团大力开展消灭痢疾、疟疾、下肢溃疡等常见病为重点的群众卫生运动，取得良好效果。

1933年6月，红军卫生学校校长彭真调任一方面军卫生部部长，陈义厚调任卫校校长。陈义厚任校长不久，卫校迁至瑞金朱坊、洋江下一带。总卫生部决定将洋江下红色中央医院(由傅连璋任院长的原汀州福音医院为基础组建)隶属于卫校，作为附属教学医院，陈义厚兼任该医院院长。陈义厚出任校长期间，是红军卫生学校扩大发展的重要时期。期间，他带领全校师生员工艰苦创业，自编自印讲义教材，自己搜集、制造各种标本、模型和挂图，先后建立了图书室、模型室、试验室。这期间，卫生学校先后招收了军医四至九期学员，并扩大了护训班、卫生员班、调剂班和卫生员等短期训练班，附属医院的住院床位也由原来的五十张扩大到三百张，在校学员达五百余人。作为卫校的主要领导人，陈义厚为新校址的建立和扩大发展，付出了全部心血，作出了卓越贡献。

陈义厚医术高明，医德高尚，与傅连璋、李治、戴济民并称红军卫生界的“四大金刚”。他忠诚积极，为人正直，热忱稳健，平易近人，受到学员的尊敬和爱戴，大家都把他看作一位忠厚长者。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退出苏区开始长征。为了统一管理留下的医院和伤病员，成立了苏区医院管理局，陈义厚任该局副局长(局长为王立中)。在国民党残酷“清剿”中央苏区的恶劣环境下，1935年春，陈义厚在指挥部队转移时，遭敌机轰炸不幸以身殉职，壮烈牺牲。历史将永远记住陈义厚的英名。

(李壮壮整理)

---

\* 本文根据冯彩章，李葆定《中央苏区四大名医：陈义厚》一文部分内容改编，原载冯彩章，李葆定著《红医将领》，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年版。

## “红色神医” 傅连璋\*

傅连璋是一个由基督教徒转变为红军医生和共产党员的传奇式人物。他曾帮助毛泽东、贺子珍、徐特立、刘伯承、罗荣桓等医治疾病，其中为陈赓将军治疗腿伤的故事尤为出名。

1927年8月30日，南昌起义部队南下时，遭受国民党钱大钧部四个师的围追堵截。激战了一天，敌人被击溃，但起义军也损失巨大，有三百名将士受伤，严重影响部队行军。

起义部队到达长汀后，在长汀福音医院院长傅连璋的支持下，决定由福音医院接收这些伤病员。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大部分伤病员得以恢复健康。

但是十二军三师六团一营营长陈赓伤势特别严重，转战以来，他左腿两处中弹，膝盖处的筋被打断，胫骨骨折。敌人围追不断，战时急行军也没来得及治疗。加之天气炎热，腿部严重发炎，红肿得像根大象腿，玻璃一样透明。长汀各医院名医会诊，一致认为需要截肢医治，才能保住生命。

陈赓将军说：“如果一个战士没了一条腿，那还怎么行军打仗呀？我一定要为革命事业保住这条腿！”

医生们看到这个铁铮铮的汉子用哽咽而又嘶哑的声音苦苦哀求着要为革命保存这条腿的时候，心里都痛苦不堪；但心有余而力不足呵，大家也只能默默为他惋惜。

傅连璋看在眼里，痛在心里：截肢容易，但一条好汉从此落下一辈子残疾，那是件多么痛苦而悔恨的事。他决定：即使没有十足的把握，没有什么经验，也要与命运搏一搏。因为他是内科医生，对外科不太懂，所以每天晚上查阅大量医书，即使他的眼睛红肿，但他仍然坚持。

傅连璋和医生、家人等商量后，将陈赓接回他家，采用特级护理和“保守疗法”。他亲自上山采集稀有的草药，每隔三个小时就用蒸馏盐水、中草药清洗伤口，还经常半夜爬起来观察陈赓的病状。

“好点了吗？”傅连璋亲切地问。

“现在好多了，就是腿还很痛，用不上力！”陈赓平静地回答。

---

\*本文选自《井冈山的红色传说》（六），张泰成主编，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

望着陈赓憔悴的脸，他紧握着陈赓的手安慰到：“你的腿不久就会好的，不用担心，我一定会治好你的腿，相信我！”陈赓听到后，感动得眼含热泪，频频点头。

有一天晚上，陈赓的腿痛又发作，还伴有发烧头痛，病情紧急。傅连璋连忙赶来，检查后发现伤口还是受到感染，又是一夜未眠；欣慰的是，到早上陈赓的烧退了，病也得到控制，现在正平静地睡着。

傅连璋还让陈赓喝中药，同时也帮他坚持锻炼身体。因为陈赓不能双脚走，他每天早起，扶着陈赓散步，听陈赓讲自己革命的事迹，这更加让傅连璋敬佩陈赓了，也慢慢地促使傅连璋走向了红色革命道路。

为了给陈赓补充营养，增强体质，傅连璋还将他自己养肺病的牛奶让给陈赓喝。

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陈赓终于可以骑马奔跑、带兵打仗了。有一次，他还跟傅连璋开玩笑地说：“傅医生，我们来一次赛跑吧？”

不久，傅连璋又多方疏通，自费将陈赓等伤病已愈的战士安全地送到广州。从此，战场上又多了一位英勇作战的将军——陈赓。

为革命事业一直默默奉献的傅连璋也被誉为“红色神医”。

(口述：范春森；地点：福建省长汀县博物馆；整理：郭合秋 黄惠运)

## 傅连璋弃轿\*

“吓，什么老爷？还坐了轿子！”

“这么多东西，是行军还是做生意？”

“前些天毛委员来我都见了的，和普通士兵没什么两样。这个比毛委员的官还大？”

“这是哪个部队的首长，这不违反咱红军的纪律吗？”

迎面走来的红军队伍中，一顶民轿格外显眼，轿夫都是红军战士，轿子后面还有人抬着八个大箱子。这支与众不同的红军队伍吸引了大家好奇的目光。乡亲们驻足围观，议论纷纷，路过的其他部队的红军战士也都啧啧称奇。

轿子中的人好像听到了外面的议论，喝停了轿子，急匆匆地跳了出来。只见此人一身考究的西装，皮鞋擦得锃亮，西式分头一丝不乱，怎么看都很难把他与平日里的红军联系起来。

他不是什么老爷、商人，也不是红军部队首长，他叫傅连璋，汀州福音医院的院长，正在跟随红军从长汀转移到瑞金。而他身后的八个大箱子里，装的是比任何金银财宝都还要珍贵的药品及医疗器,,,,,,,,,,,,,把福音医院整体迁到瑞金，组建为中央红色医院，同时又把自己的所有家产捐献出来。为此，《红色中华报》曾刊载文章《红匾送给捐助巨产的傅院长》，称赞他是“苏区第一个模范”。

这次坐轿，就是要护送大批医用物资到瑞金组建中央红色医院的。本来傅连璋是要求和同志们一起步行的，但组织上考虑从长汀到瑞金距离虽不算远，可是路上群山阻隔，道路崎岖难行，再加上傅连璋身体弱，又不会骑马，便安排了一顶民轿。毛泽东还曾亲自劝他说：“你不骑马，又不坐轿，怕是一天也撑不过来呀。”

听到人们的议论，傅连璋自感羞愧难当，自己加入了红军队伍，怎能再搞特殊呢？于是，他走出轿子，吃力又坚定地随红军队伍翻过了群山，从此再也没有坐过轿子。

在中央苏区，林彪看他东奔西走、为群众看病很辛苦，便把一头战斗中缴获的骡子送给他。

红军长征前夕，毛泽东在都病重时，傅连璋就是骑着这头骡子，日夜兼程一百八十里、从瑞金赶到于都为毛泽东治病的。

(口述：刘建明；地点：长汀县福音医院旧址；整理：吴向康 黄惠运)

---

\* 本文选自《井冈山的红色传说》(六)，张泰成主编，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

# 纪念白求恩同志\*

(1939年12月21日)

白求恩同志是加拿大共产党员，五十多岁了，为了帮助中国的抗日战争，受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的派遣，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去年春上到延安，后来到五台山工作，不幸以身殉职。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种精神。列宁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要拥护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解放斗争，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无产阶级要拥护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世界革命才能胜利。白求恩同志是实践了这一条列宁主义路线的。我们中国共产党员也要实践这一条路线。我们要和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要和日本的、英国的、美国的、德国的、意大利的以及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才能打倒帝国主义，解放我们的民族和人民，解放世界的民族和人民。这就是我们的国际主义，这就是我们用以反对狭隘民族主义和狭隘爱国主义的国际主义。

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表现在他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每个共产党员都要学习他。不少的人对工作不负责任，拈轻怕重，把重担子推给人家，自己挑轻的。一事当前，先替自己打算，然后再替别人打算。出了一点力就觉得了不起，喜欢自吹，生怕人家不知道。对同志对人民不是满腔热忱，而是冷冷清清，漠不关心，麻木不仁。这种人其实不是共产党员，至少不能算一个纯粹的共产党员。从前线回来的人说到白求恩，没有一个不佩服，没有一个不为他的精神所感动。晋察冀边区的军民，凡亲身受过白求恩医生的治疗和亲眼看过白求恩医生的工作的，无不为之感动。每一个共产党员，一定要学习白求恩同志的这种真正共产主义者的精神。

白求恩同志是个医生，他以医疗为职业，对技术精益求精；在整个八路军医务系统中，他的医术是很高明的。这对于一班见异思迁的人，对于一班鄙薄技术工作以为不足道、以为无出路的人，也是一个极好的教训。

我和白求恩同志只见过一面。后来他给我来过许多信。可是因为忙，仅回过他一封信，还不知他收到没有。对于他的死，我是很悲痛的。现在大家纪念他，可见他的精神

---

\* 本文选自《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毛泽东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



※※※

29

## 为革命绽放生命\*

1927年春节刚过，辞旧的爆竹声还没来得及把苍茫的大地震碎，老百姓就开始为新的一年的一年的劳作纷纷忙碌起来了。

在通往莫斯科的路上，车厢内烟雾缭绕，嘈杂声混着火车的轰鸣声不绝于耳。除此之外，一切还是那么死气沉沉，让人压抑的喘不过气来。唐义贞静坐在车厢里，她是前往苏联求学的，她托着下巴，眺望窗外，看着远方高低起伏的山峦，若有所思有一脸茫然。一进入苏联的地界，洋葱头式的高大典雅的建筑映入眼帘，宽敞的大街上车水马龙，一切又是那么的井然有序。唐一贞揉了揉疲惫的双眼，好奇的观望着四周。

好不容易到了莫斯科中山大学，报名，领书……唐义贞开始了她的大学生活。在紧张而漫长的求学中，唐义贞几乎每天都沉浸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的浩瀚书海中，唯一的空闲就是收听有关中国的广播。感苏联之强大，叹祖国之弱小，忧国民之孱弱，唐义贞愈发感觉到探索救国之路的迫切。

1929年初，唐义贞迎来了她人生一大转折。她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认识了陆定一，在异国他乡两个热血青年有相同的感受，共同的见解，每次见面都有说不完的话题。共同的观点和革命信念使他俩深深相爱，成为知己。是年12月，唐义贞特意换上一件最喜欢的平时不轻易穿的红丝绒旗袍，与陆定一在莫斯科举行了婚礼。并请了几个同学聚餐，还自己动手做中国菜，两个人都下决心为革命奋斗终生。因反对王明把持的中山大学“支部局”的错误领导而遭迫害，被开除团籍和学籍。

1930年，陆定一受到严重打击，奉命随中共代表团回国，在上海任团中央宣传部部长，第一次同唐义贞分别。同年10月，唐义贞也奉命回国到上海，与陆定一重逢。团中央决定恢复了唐义贞的团籍。1931年春，党组织决定唐义贞到闽西苏区工作。随着中央苏区的扩大，卫生保障工作的任务日益艰巨。鉴于唐义贞出色的领导能力，1932年初，党组织决定，任唐义贞为“胜利县”卫生材料厂厂长，领导职工为红军生产了合格的消毒纱布和消毒棉花。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在唐义贞大力发动群众，自力更生，将一个规模不大，设备简陋的厂逐渐发展为有五个车间的具有相当生产规模的综合药材工厂，

---

\*本文根据陆定一《关于唐义贞烈士的回忆》一文改编，原载福建省长汀县政协文史资料编辑室《长汀文史资料》（第14辑），1988年版。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唐义贞留在中央苏区继续斗争。1935年1月下旬，敌军来势凶猛，她不幸被俘。紧急之下，她想起衣袋里还有写明下一站会合地点的纸条，便迅速掏出纸条在口中嚼了几下后吞入肚中，敌人注意到了她的这一动作，气急败坏地呵斥她将东西吐出来，用棒棍、皮带抽打，施以酷刑，见她毫不屈服，他们竟然残忍地切开她的喉咙乃至腹部，在满是鲜血的肠胃中翻找嚼烂的纸条。一位年仅25岁的年轻生命为革命事业流干了最后一滴血。

[illegible]

31

## 中药铺锐变红军医院\*

这是讲述一间中药铺发展成红军医院的故事。

1929年7月，红四军解放了林茂的家乡——福建省上杭县才溪乡。翻了身的才溪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了苏维埃政权，组成了赤卫队和农民协会，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斗争。打土豪，分田地，压在人民头上几千年的封建主义大山，开始崩溃了！共产党的政策顺民心，红军处处为人民。千百万真心实意拥护革命的群众，真正发动起来了。十二岁的他在这革命浪潮的推动下，也毅然投身革命，参加了工农红军。

不知不觉林茂加入红军已经有两个月了。在两个月里，他真切地感受到了红军为百姓为人民着想。一天接到上级的通知，上杭县苏维埃政府为支援工农红军，命令才溪乡设立医务所。于是乡苏维埃政府决定，将他们乡王赠接、王坤发父子经营的中药铺改为才溪乡医务所。王坤发的接骨技术很有名气，经常有人慕名远道而来找他接骨。

1931年春，医务所又奉上级的命令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福建军区临时后方医院，林茂加入医院成了一名看护员，亲眼见证了红军医院的发展壮大。最开始时医院设在庄背庙，后来又迁至癩古窝。王赠接父子无条件地把整个中药铺所有的药材、器皿，通通捐献给医院，这也是建院初期的全部家当。其实说是医院，但是人手也是够“精干”的：院长王赠接、外科医师王坤发、内科医师吴锡福、司务长林金育、制药工邱森进、加上他和林金鉴两名看护员，满打满算共7个人。而这7个人当中，除院长、内外科医生之外的几个人都和林茂一样，是不懂医药、少不更事但充满干劲儿的孩子。

医院是在战争中不断发展壮大的。记得在攻打上杭的战斗中，两位红军女卫生员护送40多名伤员来到中医院。一下子接收这么多重伤员，是建院以来头一次。这一次，尽管他们忙得几天几夜合不上眼，可却是一次极好的锻炼和提高。两位女卫生员在这几天的看伤治病过程中，手把手地教大家清创、止血、固定、包扎、换药等许多技术，并传授了不少医疗救护的知识。这次任务为医院后来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还清楚地记得，当时在福建军区任作战参谋的伍修权，就因作战负伤来医院住院治疗。出院时他曾对医院的工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自到才溪医院，生活和情绪比较安定。医院里伤员不少，但管理非常有序。院长和医师工作很认真，亲自检查、治

---

\*本文根据林茂《从一间中药铺发展起来的红军医院》一文改编，原载中共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编《福建党史月刊》2007年第2期

疗我的伤口。”说我们的工作认真的，这是千真万确的，但我们当时的物质条件却是十分困难的。我们这些工作人员都是从家里带着干粮来上班，而且工作服也是自备的。伤病员来了，有时竟无米下锅，就连伤病员吃饭的碗筷，也是从老乡家借来的。

解放了的才溪人民，热爱共产党，对待红军就像亲兄弟一样。每当医院接收了伤病员，乡亲们就会主动赶来送茶送饭。当时红军作战频繁，生活艰苦，外地同志水土不服，病号很多，医院人员看护不过来，但好在乡亲们给予我们很大的帮助。如果分派到谁家供饭，乡亲们总是把平日舍不得吃的东西拿出来给伤病员吃。住在医院附近的大娘、大嫂们常常是不用招呼自动地到医院来帮忙照顾病人。至于分散到老乡家去的伤病员，他们的饮食陪护均由房东一手包下来，从不计较任何报酬。就在这种救治任务重、医疗条件差的困难情况下，我们靠着苏区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援，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完成了一批又一批伤病员的收治和转送任务。为此，曾多次受到军区的表扬。

1932 年春，军区指示才溪临时中医院与白砂第二分院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福建军区第二医院，院址迁往南阳黄蜡坑。从此，医院条件大为改观，增添了不少医疗设备，开设了内科、外科、手术室和中、西药房等等，编制和队伍也大有改善。外科医师黄进一，是湖南医学院毕业的，在当时，他就是高级专家。中医院从此有了开展肢体手术的能力，不少伤员的生命得以保全。不过那时治疗枪伤的西药极为宝贵，就连消毒用的石炭酸，包扎伤口用的纱布条也奇缺。

就是这样一所从中药铺发展起来的红军医院，不仅完成了大量的伤病员救治任务，而且还培养出一批革命的白衣战士。回顾这所医院的发展历程，无疑是无比艰辛的，但却从来没有辛酸之感。相反，总是为之感到振奋，受到启迪。“兵民是胜利之本”，有了军队和人民的团结和进步，我们就是无往而不胜的。

(孙宇宁 刘寅整理)

[illegible]

林茂：时为红军医院看护员。

## 福音医院初现革命激情\*

1925年，“五卅”爱国运动的浪潮激荡了福建长汀城。群众纷纷举行示威游行，签名通电全国，反对英、日帝国主义侵略。长汀城内有一所由英国教会开办的福音医院，英国医生在这次群众的爱国运动中被人民的声威所吓跑，群众便推举傅连璋当选为福音医院的院长。

傅连璋曾经读到一些马列主义的书，懂得了光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并不能完全解除劳苦大众颈项上的枷锁，还必须进行阶级斗争。随后，又接触了邓子恢等共产党人，并开始阅读革命书报，对中国的局势和革命事业的发展有了清晰的认识。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发生后，他对南昌起义军的情况特别关心。

8月中旬，起义部队南下，受到国民党军大部队的追击。傅连璋估计很快就要打仗，于是赶紧作好接受伤员的准备，他马上和汀州全城的医生们约好，以福音医院为中心，成立组合医院。那时，傅连璋还在几个学校担任校医，就又约好了许多教员和学生来担任护理工作。

过了十多天，有几个扎武装带的军官来找傅连璋，他们一说明来意，傅连璋就说：“早已准备好了！”并带他们在医院内外看了一遍，告诉他们哪儿是手术室，哪儿安置伤员。军官们听了后，都高兴得一个劲儿说好。

8月下旬，起义军和国民党的部队在江西的壬田和会昌，先后打了两大仗。起义军的三百多个伤员被送到汀州来。会昌离汀州有一百八十里山路，那年气候又特别热，许多伤员伤口都化脓了，必须赶快开刀。可是，能动手术的外科医生只有两个，傅连璋学的是内科，外科也懂得些，凑上去也才三个人。三个人要给三百多个人动手术，还要进行其他治疗，对他们来说真是紧张得气都透不过来。不过大家热情都很高，白天黑夜连着干，从没一个人说累。只是每个人心中还有一点小矛盾：因为这时候起义军已经开到汀州了，在病房里也可以听到大街上整齐的步伐声、口号声，沸腾的欢呼声，一听到这声音，大家心中就像擂起鼓来，激动得很，谁都想到外边去，哪怕看一眼也好，可是，谁又不愿离开伤员一步。

那时，护理人员大多是青年男女教员、学生，他们不但没有经验，许多人一看见血就发抖，一看见脓就要呕吐；可是后来都抢着替伤员洗伤上药，喂水喂饭。武昌大学学生张成荣、阙宝兴放暑假回来，也参加了护理工作，一连几夜不睡，眼睛熬得通红。那

---

\*本文根据傅连璋《南昌起义的伤员》一文改编，原载《革命斗争回忆录（上）》，江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 野战医院找粮食\*

长征路上，红五军团困守在四川西北部丹巴一带少数民族地区，这里人烟稀少，物资极其缺乏。红五军团经过长途行军作战，部队伤亡非常严重，原来一个军团近万人，缩减到两个团不到二、三千人。之后从部队和医院抽调了一部分医务人员共一百人划归军团卫生部直接领导，组成了野战医院。

野战医院分为两个所，都设在离卫生部不远的地方，这个地方叫观音河，是彝族地区。其中卫生一所位于观音河后沟的一个村庄，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为几十名伤病员进行医治。

卫生一所共有六十多名工作人员，所长叫张络，还有一位指导员，支部书记叫张其榜。卫生所下设两个看护班，一个男看护班，一个女看护班，每班都有十几个人。男看护班班长是李盛礼，女看护班的同志是红四方面军编过来的，都是四川人。她们工作认真负责，不怕脏、不怕累、同男同志一样抢着干工作。大家一道工作，如同兄弟姐妹，工作中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卫生所还有一个洗衣班，专门为伤病员洗衣并缝补衣服；一个炊事班，负责伤病员及全体工作人员的伙食。这两个班每班十几个人，都是女同志，也是由红四方面军编过来的。还有一个十几人组成的担架排。

卫生所驻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和生活条件极端艰苦。一缺粮食，二无药品，就连常用的阿司匹林，外用的红汞、碘酒都没有。面对困难和挑战，卫生队员自力更生上山采草药，回来熬成汤给伤病员服用。还采取其他土办法，如熬姜汤、胡椒汤等用来治疗一般的伤风感冒；发疟疾没有奎宁，就用针刺穴位等办法进行治疗。对因负伤生疮的外科病人，每天用食盐水冲洗伤口，然后盖上土“敷料”。用花椒水给溃疡病和患“疔疮”<sup>1</sup>的病人冲洗伤口。当时，从敌人那里缴获的一点红汞、石炭酸、米苏尔等药品都被视为珍宝，轻易舍不得使用，只能给特殊的重伤员适当地用一点。在这种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除了采用上述方法给伤病员治疗外，更重要的是全心关怀、精心护理，真正做到急病人之所急，痛病人之所痛，待伤病员如亲人。那时生活上的困难是难以想象的，常常好几天没米下锅，只能靠上山、到野地里去挖野菜，扒树皮，采野果。把凡是能吃的野

---

\*本文根据李盛礼《长征途中的医院工作》一文改编，原载中国医院管理杂志社《革命卫生工作回忆录》，人民卫生出版社1986年版。

<sup>1</sup> 注：俗称老烂腿



菜、树皮、草根等都采回来充饥，医务人员及其他工作人员总是自己不吃或少吃，尽量让伤病员先吃。

快到秋天的时候，山上和田野里的树叶、野菜、野果都被采吃光了，野战医院的伤病员和工作人员面临饥饿、寒冷的威胁。这时，突然接到军团司令部的命令，要卫生所派十几名同志随部队出发，到二百多里地的打牛场去寻找粮食。听到这个消息后，大家都非常高兴，所里派指导员带领男看护班及三、四名女同志去完成这个任务。他们匆匆做了一点物资准备工作，就随同部队轻装出发了。经过六天的跋涉，行程二百多里，先头部队传来消息：在一片广阔的草原上，少数民族牧民在那里放牧，牛羊成群。听到这个消息，大家都高兴极了。当天到达宿营地休息，第二天天刚亮，指导员就带领他们到七、八里地以外的地方找粮食，结果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只是从一些房子的地板上扫起来少数民族遗留下来的少得可怜的一点粮食。下午四点钟左右，指导员还在楼上找粮食没下来，突然听到几声枪响，大家立即跑到村外集合，同时命令两名女同志站岗放哨，等指导员回来再走。但等了半天，也不见指导员下楼来，后来才发现指导员已经中弹牺牲了。

长征途中野战医院的全体工作人员，就是在这种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全心全意为伤病员服务，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

( 谢烨峰整理 )

[illegible]

李盛礼(1916—2012),江西吉安人,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红军10师政治部宣传员、一军团政治部宣传员、红五军团卫生部一所看护班长,长征时期担任看护班班长。新中国成立后,任天津市抗美援朝志愿军军医疗大队政委兼副大队长、天津市市总医院副院长、院长、书

## 深山找医院\*

1934年11月，部队（独立三团）来到了江西安福县的钱山，不幸遭到国民党军一个师的进攻，战斗持续了一整天。当时，敌我力量悬殊仗打得十分艰苦，不少同志牺牲了，不少同志负了伤，彭寿生也在内。撤出战斗后，组织上交给彭寿生一项任务，负责带领六名伤员到医院治疗。其余人员则继续前行。可是，他们要去的医院连名字也没有，更加没有详细的医院地址。当时，只有辅导员在临行前告诉他们，医院大概是在九龙山的西北方向，医院的负责人是郭指导员。找这样的医院就像大海捞针，无处可寻。接到命令后，彭寿生带着六名伤病员开始了一段艰难的寻找医院历程。

彭寿生说：“九龙山，我熟悉，它位于安福萍乡交界处，是一座有千米高的大山，山体绵亘数十里，与武功山连成一片。”这是一片茂密的森林，山上满是大树、茅草，路高高低低不平，十分难走，别说伤员，就是健康人，爬上山也要费很大力量。但是，彭寿生决定连夜赶路，争取早一点找到医院。这样也能让伤员们早日得到治疗。

天是如此的黑，空中只有寥寥几颗星星在闪耀着幽光。山上十分静谧，静谧的连呼吸声也听的清楚。队员们就这样走着走着，拖着疲惫的身体，艰难的前行着。彭寿生不时回头来催促战友：“走快些！”因为如果不敢紧找到医院，敌军又要发现大家了！可是，七个人当中除了小贺和彭寿生伤势轻些，其它几名都是重伤员！平时，伤势这么严重，理当有担架抬着，但现在只能靠步行。有一名战士伤在头部，流了很多血，一路上直哼哼，只能互相之间吃力的搀扶着他，一步一颠地，有好几次险些滚下山崖。大家就这么艰难的前行着。因为伤势，七名伤员只能缓慢的前进，一晚上走下来，仍然在半山腰。待到天亮以后，伤员们顾不上吃饭，又继续赶路，直到下午，伤员们又饿又累实在支持不住了，于是大家一同找了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坐下来，取出身上带来的干饭团嚼了起来。伤势较轻的同志还解下身上的小铅罐，来回给同志们舀泉水解渴。

山，无边无际，医院遥遥无期。伤员们不断的走啊走！找啊找！翻过一座山头又一座山头。可是医院总是不出现。这时，大家都焦急起来，“医院在哪里，何时能找到？”彭寿生见状，安慰大家：“只要医院在这一带山里，就能够找到的！”就这样，大家又鼓起信心，伤员们又找啊转啊！不知道过了多少天，大家终于找到了这所不知名的医院。

---

\*本文根据彭寿生《高山上的火苗》一文改编，原载中共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著《江西党史资料》（第二十二辑），1991年版。

据描述，当时这家医院的病房设在一个洞里，需要弯着腰才能进去，洞里光线不好，黑乎乎的又潮又暗。只在洞口透进来一丝光亮，算是唯一的照明。洞子里排着三、四十张用树枝架起来的床铺，床上也躺着好些伤员。郭猛指导员看见伤员，立马指着右边尽头的几张空铺床，叫伤员们躺下休息，就这样，彭寿生和六名伤员们开始了医院生活。

艰难的寻找医院历程，需要多少体力，多少毅力啊！因为伤员们的坚持，医院还是被找到了。

(熊沁颖整理)

[illegible]

彭寿生(1915-1993),江西萍乡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粤赣军区独立三师师部技术书记,红九军团军团部见习参谋,第九军司令部政治指导员。参加了长征。

## 傅连璋献医院\*

福音医院是一所教会医院，从 1927 年开始，它就为红军伤病员服务。虽然它已是一所红色医院，但为了能到白区购买药品、订阅报纸，依然保留着教会医院的名称。1931 年 11 月 7 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成立了，当时的瑞金还没有一所正规医院，时在福音医院养病的毛主席对找到傅连璋，对他说：“我们要有个自己的医院。福音医院是基督教会医院的名字，我们把它改成中央红色医院，傅医生你看怎么样？”

傅连璋拍手称赞，表示非常同意。

毛主席叫傅连璋到瑞金去，找中央政府副主席项英同志，请示关于创建红色医院的事。傅连璋心想，毛主席是中央政府的主席，毛主席决定了就行了，何必还要到瑞金去请示呢？但毛主席说，这只是他个人的意见，决定这事应该通过组织，和大家商量，事情办起来就能周到些。经过请示，中央也同意了。

但是当改编工作刚刚开始时，国民党部队进攻闽西了。毛主席找到傅连璋说：“蒋介石的军队打来了，你怎么打算？”

“我跟主席到瑞金去。”傅连璋语气坚定并且毫不犹豫地说。

“医院呢？”毛主席问。

“搬到瑞金去。”他回答道说。

“好啊！”毛主席高兴地说，“我到瑞金后，派人来帮你搬医院。”

临走时，毛主席又关切地问：“你走了，你的家怎么办？”

“也去，我相信我母亲和家里的其他人都是乐意到瑞金去的。”

毛主席想了想，说：“好吧！路上要小心，你母亲年纪大了。”

“你放心吧，主席。”傅连璋感激地回答。

毛主席回瑞金后没过几天，果然派来了中央政府办公厅的傅公侠同志，和傅连璋商议搬医院的事。

医院里的工作人员，从医生到护士，全都愿到瑞金去，这就解决了个大问题。伤病员中，除了痊愈的可以出院，其他也转移到瑞金去。医院里的东西，从仪器到药柜，从床铺到桌椅，不论是原来医院中的财产，还是傅连璋的私人东西，除了搬不走的地和墙，

---

\*本文根据傅连璋《中央红色医院的成立》一文改编，原载傅连璋著《在毛主席教导下》，作家出版社 1959 年版。

只要能搬的东西全部都搬走，甚至是窗户上的玻璃，都献给了革命。

医院决定搬到江西瑞金叶坪的洋江村下。傅连璋派陈炳辉和傅公侠一起去瑞金打前站，安排房子，接收转移去的伤病员，整理搬去的东西，傅连璋自己则留在长汀，负责搬运前的工作。长汀和瑞金相距八十里路，一百七十个挑夫搬了整整两个星期，才把医院从福建长汀搬到瑞金。为了表示自己破釜沉舟的决心，傅连璋还把自己多年积累的4000多块银元，全部都换成了当时苏维埃政府发行的苏维埃币。

傅连璋全家人也随医院到了瑞金。正如他所料，老母亲虽然年纪大了，但很乐意搬这次家，因为党中央和毛主席在瑞金。

1933年初，在毛主席的亲自指导下，中央红色医院正式创立了。

(郭良整理)

[illegible]

陈炳辉，时任中央红色医院医务主任，傅连璋女婿。

## 黄 冈 医 院\*

在中国各地，形形色色的医院非常多。可是在黄岗，却有一间不同寻常的医院。这个医院能够收容一千多名伤病员，对革命作出了很大贡献。这就是黄岗医院。

1927年，湘南特委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创办了黄岗医院，也许有人会这样想：能够收容一千多伤病员的大医院，大概医疗设备很不错，医务人员很多吧？其实并非如此。在艰苦的岁月里，战斗十分频繁，敌人实行严密封锁，就是平平常常的日常用品也禁止运到苏区。医院需要的一切物资，都依靠自己想办法，自己动手，自力更生。

当时，黄岗医院的院部设在一所破庙里，院内除了一些陈旧的桌子、板凳外，真可说是一无所有。哪里有什么医疗器械呢？没有。连一些现在看来是极平常的探针、镊子也没有。但是，毛主席领导的红军，什么都可以制作。山上有的是竹子，医务人员就用竹子削成探针和镊子。大家集思广益，用土办法制成了许多替代品，如外科用的镊子、剪子、锻子、锯子等，都是自己土造的。

提到药品，更是可怜，除了一些红汞、碘酒之类的常用药品外，没有一点贵重药品。怎么办呢？医务人员用土蒸馏器配制了一些注射液，虽然数量不多，倒也是“雪中送炭”，治了不少病。另外，还组织有经验的土专家，带着一部分青年，上山采集药材。有了草药，医院就成立了一个草药科，自己配制丸、散、膏、丹，以满足治疗上的需要。没有棉花和纱布，就发动大家动手纺纱织布，无论是医务人员还是伤病员，都不舍得丢掉一个棉球、一寸纱布，总是搜集起来，洗了再用，用了再洗，直到实在不能使用为止。院内仅有的几把血管钳子和一个三折器械包，大家都爱如珍宝。使用注射针头，总是磨了又磨。一副旧的橡皮手套，谁也舍不得去戴它，就这样，他们战胜了物资奇缺的困难。

同其他任何革命工作一样，群众的积极支援，是取得胜利的基本保证之一。那时，医院根本没有固定的病房。收容的一千多名伤病员，除重病的隐蔽在深山密林里以外，轻伤的散住在老百姓家里。整个医院只有四个医生，护理人员也只有七、八十个人。为了让伤病员尽早地恢复健康，重返前线，当地群众都自动地帮助医务人员做一些护理工作。敌人进攻的时候，他们便热情地帮助医院及时地把伤病员转移到深山里去。同样，医务人员也很爱护群众，除给他们看病外，还尽量抽出时间，帮助烈士军属和穷苦农民

---

\*本文根据戴正华《黄岗医院》一文改编，原载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编《创业维艰——回忆红军时期的卫生工作》，中国人民解放军出版社1983年版。

耕地、收割、打柴、担水……整个医院和群众的关系，正像我们军队和群众的关系一样，是鱼水关系。

在这种伤病员多、居住分散的情况下，全院医务人员都是昼夜辛勤忙碌着。每天要翻山越岭去给伤病员治疗，端着盆子挨门挨户给轻伤病员换药……山前庄后，从不得闲。在医院里，上下亲密无间，领导干部和群众一样，见到什么事情就干什么事情，而且都抢着干。一些困难的任务和艰巨工作，总是领导干部首先抢着干。医务人员一方面对伤病员进行医疗护理，另一方面也做政治工作。

那时，人们坐办公室的现象是没有的，整天都在群众之中。每逢前方打了胜仗，或者各种纪念节日，医院都组织报告会，医务人员都自动组织起来，排练各种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到附近村庄和各家各户向伤病员进行宣传和慰问。伤病员们为了尽快地恢复健康，归队杀敌，都能主动配合治疗。所以，那时住院在两个月以上的情况是很少很少的。伤病员和工作人员之间的那种唇齿相依的关系，真是比家庭中的兄弟姐妹还要亲密。

当时，黄岗医院医务人员的生活是很艰苦朴素的。为了粉碎敌人的封锁，他们自己种瓜种菜，养猪积肥，制造硝盐，一年四季穿草鞋，下雨阴天就干脆赤脚。那时，个人的全部财产，都是一个小包袱，内装一、二件单衣裤。穿的衣服，件件都是补了很多次的。可是，大家对革命工作都满腔热情，上进心很强。医院为了提高医务人员的业务水平，经常组织上医护课，内容不是很复杂，但教的耐心，学的勤奋，都能联系实际，所以大家业务水平提高很快。

这一批同志后来都成为湘赣军区、红十七师和红六军团的卫生工作骨干。

（黄菊萍整理）

## 井冈山红军医院\*

1928年初，朱德、陈毅的部队上了井冈山，与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

随着红军部队的不断扩大，红军在宁冈茅坪成立了一个医务所，后在大井村又设立了医务所。后来，战争频繁，伤病员逐渐增多，医务所就不够用了。到了1928年5月，决定将医务所扩大成为红军医院，指派邓允庭同志负责领导医院的工作。

医院下分四个管理组，负责管理伤病员治疗和生活等，第一，二组在大井，第三组设在中井，第四组设在小井。红军战士的伤病员多半分在第三组，每组有医务主任一人，医生两人，护理人员要看伤病员多少人临时由部队或从地方上派来，有时一个重伤员专门有一个人护理，轻伤员一般都是三四个才有一个护理员。当时有一个医务主任是被俘虏过来的一个国民党医官，叫段执中，他一开始表现地不太好，经过一段时间教育，表现才逐渐好转，他常说要立功赎罪，后来才当上医务主任，另外两个医生，一个叫资彬，另一个叫徐鹄，第三组有个女医生叫伍辉国，另外还有一个男医生。

红军医院的药品，起初主要是中草药。医院有一位同志叫谢秋月，是宁冈茅坪人，还有两位草药医生是父子俩，父亲叫吴海泉，儿子叫吴文奎，他们是湖南人，专门负责挖草药，用草药。七溪岭战斗后，在永新县城，国民党杨池生、杨如轩两个师的大批西药被缴获并运到宁冈象山庵，堆满了两个房间。从这个时候起，以中药和西药结合，但有好多西药我们的医生还不会用，红军部队的医生要俘虏过来的国民党医生教他们，开始他们不肯教，经过耐心的说服教育，才愿意教我们的医生使用各种药品。

医械器材，开始也是什么都没有，打七溪岭时从敌人手中缴获了一批器材，医院的装备才逐渐改善。

当年红军的生活很艰苦，吃、穿、用都完全靠打土豪和从国民党军队中缴获而来。当时规定红军中不分官兵，每人每天菜金五分钱。毛泽东说，对医院伤病员要特别照顾，每人每天给一角钱的菜金。一角钱的菜金不能用完，要想办法节余一点，将节余下的钱，发给每个伤病员零用。

医院伤病员一天吃三餐，有稀有干，饭菜都由各连队食堂按时送到伤病员的病房。

---

\*本文根据王云霖《回忆井冈山上的红军医院》一文改编，原载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编《井冈山根据地》（下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





## 行进的医院\*

在长征路上，野战医院的医生和看护员是最辛苦的。他们除了和大家一样背自己的行李和带粮食以外，还要携带急救药品等。不论跋山涉水、刮风下雨，不论日行军、夜行军还是急行军，他们对于伤员的治疗和护理工作从来没有间断过。因此，轻伤员能够健康归队，这个功劳不能不归功于医生和看护员了。

在日行军时，每次总是先派出几名看护员，随同该营员一起前进。如果路上有大休息，派出的看护员就留在大休息处等着，烧开水准备消毒。等休养员一到，把背包放下，医生抓紧看病，查问病情，开方给药，看护员进行消毒换药。如果在村里休息，看护员还要找老乡借盆子打稀饭，上完药，照顾休养员吃上饭以后，自己才能吃饭。饭后赶快收拾，送还盆子，然后自己才能休息。遇到休息时间短，看护员就根本得不到休息。

夜行军时在出发前，医生先看病。根据病情，哪几个休养员由看护员跟随哪几个需要医生跟随，做出安排，便于随时抢救护理，以防不测。看护员还要准备外科卫生器材，进行消毒，给伤员换药，将换下来的绷带尽快洗净，分给每个看护员带走。

在长征途中，急行军是经常的事，每天走 90-140 里总有四十多次，比如突破敌人湘江封锁线，巧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渡过天险大渡河等，都是急行军。部队需要急行军，医院也跟着需要急行军，在急行军中，医生带着司药，背着药包，两个人一块走，在伤病员队列里走前走后，进行巡诊。医生看病，司药发给内服药。外科医生和看护长根据病员情况，分成若干组，每组两个看护员看护八、九个伤员，实行包干换药，每小时休息一次，休息期间赶紧换药，不致伤情恶化。

到达宿营地时，医生和看护员马上查看伤病员情况，照顾他们吃药等等，不辞辛劳。

长征过雪山途中，身体强的帮助身体弱的，手脚灵便的帮助手脚有伤的，大个子帮助小个子。越往上走，气温越低，脚下的路也冻得硬梆梆的，同志们带的棍子开始发挥作用了，好象增加了一条腿。大家鼓起了勇气，继续往前上，到达山腰，亮晶晶的积雪，又硬又滑，一不小心，就会滑下雪崖。看护员分散跟随自己负责的伤病员。空气越来越

---

\*本文根据王英高《最辛苦的是医生和看护员》一文改编，原载高恩显，高良等编《新中国预防医学历史资料选编》（1），人民军医出版社 1986 年版。

稀薄了，有的同志呼吸发生困难了。看护员赶紧上前搀扶，不让他坐下，给他吃点辣子生姜水，情况紧急的就马上抢救。在这样的情况下，看护员除了要照顾自己的身体外，还要时刻关注伤病员和其他同志的身体状况，出现了不好的情况，就要立刻进行医治。

在艰苦的条件下，医生、看护员始终勤勤恳恳，努力工作，他们认识到，医务人员一心为革命，就是一心为伤病员服务，就是早日治好他们的伤病，让他们健康归队，增强革命力量。

（李燕青整理）

## 闽西红军医院\*

1929年6月，毛泽东和朱德率领红四军来到闽西，创建了以龙岩、永定、上杭三县为中心的闽西革命根据地。为了医治在革命战争中负伤的红军官兵，红四军的领导和中国闽西特委研究决定，由红四军军部拨一笔专款作为创办经费，在上杭县蛟洋石背村傅家祠创办闽西第一所红军医院——蛟洋红军医院。蛟洋红军医院是在红四军军部直接领导下建立起来的中国革命史上第一家正规的红军医院。医院驻于蛟洋历时6个半月，隶属于闽西苏维埃政府和红十二军领导，在当地政府和人民群众的支持下，治愈了数以万计的红军指战员，有力地支持了革命战争。

1930年，红军到上杭城时，伤病增多，上杭县苏维埃政府指示医疗所改设为上杭县才溪后方中医医院，院长王赠接医师兼任，外科医师王坤发，内科医师吴锡福、看护生林茂等4人，事务长林全育，抬扶兵一人。同时加设地方药材合作社，内有医生2人。

1931年5月间，后方中医院改为工农红军福建军区才溪后方临时医院，经费暂时由中国工农红军福建军区后方留守处供给（处长周子述，政治部主任罗兆健）。同年在通贤设立了中医培训班，教师2人，学员17人。

1932年4月，才溪后方临时医院与白砂第二医院合并为黄腊坑第二分院。分内科、外科，内科中医王时，外科王赠接、西医王进一（湖南人）。最初伤病员只有二、三十人，后增加到三百人上下，而医生没有增加。医生们克服了一切困难，一个人做四、五个人的工作，昼夜不眠的护理伤病员、治愈者占百分之八十以上。当时的群众组织了慰问队、担架队、洗衣队等，伤病员也思想愉快，情绪高涨。虽然工作紧张，医生们也都认真负责，比如有重伤不能医治的，即刻上送，群众担架就马上担送。比如王庆清的儿子在前方牺牲了，自己还担负担架工作，他的这种精神值得大家学习。

1934年8月间旧县、白砂，四处受敌人包围，第二分院迁移到四都蔡坊，红军北上时部分人员随军队，一部分人员调任地方医疗所工作。后来，蛟洋红军医院借助龙岩教会医院，利用其设备、医生和看护员，组建了闽西红军医院。

由于当时处于战争环境，当时的条件是十分艰苦的，缺医少药，医疗设备极为简陋（仅有听诊器、注射器、止血钳、镊子、剪刀、小手术刀、缝合针、托盘等），连药柜

---

\*本文根据王赠接，王庆台《十八年前闽西成立医院经过》一文改编，原载高恩显，高良《新中国预防医学历史资料选编》（1）人民军医出版社1986年版。

也没有，少量药品放在一张方桌上。药品以中药材为主，缺少西药、麻醉药更少。中药主要靠当地的永生堂、全春堂两家药铺供应，药品大都是派人到龙岩、江西等地采购，同时医院派员到本地山上采集中草药补充。卫生材料也十分紧缺，往往使用过的纱布洗净消毒后会再使用，或者以白色纱帐布消毒后代用，手术用的麻醉药品根本无法保证，有的伤员在没有麻醉下实施手术，许多伤员忍着剧痛不叫不哭，体现了革命战士的坚毅顽强的品质。可见当时的条件是十分艰苦的，可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红军组建了闽西红军医院。这种艰苦奋斗、不畏辛苦的精神是值得当代的中国人值得学习与传承的。

[illegible]

## 红军总医院\*

中国工农红军总医院的前身是吉安红色第一分院，旧址在吉安青原山净居寺，并且在1930年10月由城岗迳经坑移到兴国县鼎龙乡茶岭的。红军总医院不仅治疗伤病员，而且对当地群众的身体健康也很关心。红军医院帮助群众治病的故事在当地随处可见，医院设立了十多张病床，专为医治群众之用，这里就说说医院救治群众两三件事。

### 军医免费为群众治病

当时，东村有个群众小名叫豆腐泡，经过住院，不但把病治疗好了，而且分到了几块银洋的伙食尾子回家。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当时有一项规定：鼎龙乡周围的群众有病者均能到医院去，享受免费的治疗，而且在住院的群众不但是免费的，还有伙食尾子（伙食剩余的钱）分。还有一次，茶岭李功山同志的孩子跌了一跤，当时就跌得不会开声。李功山立即把孩子送到医院去，军官正在处理一份文件，见孩子摔得比较严重，立即停下工作，进行急救。下茶岭有一个黄秀子烂脚，医治了两年，才把脚医治好，没有出一分钱，最终黄秀子捉只落鸡给徐医官吃，徐医官不肯接，再三推让之下，结果徐医官拿了二元银洋给黄秀子，才肯收她的落鸡。

### 医院帮助群众灭火

1931年，茶岭的万岁岭发出了火灾，眼看着整山的森林就快烧光，当时的政府组织群众进行灭火，总医院也发出了命令。传令兵的号角一响，除个别护士看守病人外，其余全部都参加了灭火的工作，行动迅速又勇敢，很快就把烈火熄灭了。

### 医院帮助群众种地

在农忙时期，如蒔田割禾都会组织好人员分批的轮流参加劳动，帮助农民生产，特别是能帮助农民解决疾苦；1930年，茶岭村的耕牛发瘟死了一百多头，几乎全部死光了，农民很着急，顾虑明年春耕时耕牛成问题，田会荒了，医院的领导同志就主动的向茶岭党的负责同志提出：如农民无钱买耕牛可叫群众向我们院里借。这样缺乏耕牛的群众都向医院借，这一次就借了银洋三、四百元。不仅这样，就是平时农民生活上有困难的也可以自由地向医院借钱，在借钱时只会问一下你有什么出息（即什么时候有收入），什么时候还，只要农民答应还的时间就可以借到，到了约期，农民都会自动地还给医院。

---

\*本文根据茶岭老干部《回忆中国工农红军总医院》一文改编，原载江西赣州兴国县委党史办公室《兴国县革命斗争史参考资料》（1），手写稿。

总的来说，医院与当地群众联系也非常密切，就像鱼水之情一样，彼此依靠，互相帮助。医院会定期召开扩大会议，征求群众对医院的反映。

1934年4月，因形势和战争需要，当地政府要将医院转移到瑞金去了。转移前，医院向群众借的东西都一清二楚地归还了群众，房子也打扫得干干净净，整理得有条有理，群众也自动自觉地帮助抬伤病员，帮助转移物品。当时大家都恋恋不舍，直到现在，这样的情景仍然深深地留在人民群众的脑海里。

（李燕青整理）

## 红色医院觅红医\*

1930年5月至10月，谢焕辉在兴国县第十一区卫生队当医生。有一次，谢焕辉到省军区开会，要求军区给医院派干部、派医生。谢焕辉找到徐特立，恳请徐老师能支持自己。

徐特立同志说：“医生问题，不要向上要，而要眼睛向下，自己去找，自己去培养。”“你知道，看护长和药品保管员，一个是领药的，一个是给药的，但是一个不会开药单子，一个不认得药单子。医院时刻都要用药，必须采取措施，不能因为医生问题耽误伤病员接受治疗。”

谢焕辉听到徐特立的指示后，立刻回到兴国隆圩找到曾北澄，要他当支部书记兼中医生，再由曾北澄找一个有文化的人管中药。戴济民的加入很快解决了这个问题，戴济民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院，在吉安市开设私人医院。在与吉安各阶层人士的广泛交往中，戴济民结识了时任吉安靖卫大队大队长罗炳辉，与他成为了无话不谈的知己。在罗炳辉的引导下，他第一次见到了仰慕已久的毛泽东，当时毛泽东正好需要一位名医为患有肺结核病的周以栗治病，两人相见后，毛泽东介绍了周以栗的病情，戴济民当场问诊，开出药方。红军当时急需医生，特别是医术高明的医生。而戴济民正是一位医术高明的医生。怎样才能让他加入红军呢？毛泽东求贤若渴，随即写下一封介绍信，嘱咐戴济民去找赣西南主席曾山接洽。

在曾山的陪同下，戴济民在清原山大庙的红色第一分院看到这样的画面：遍地睡的都是伤病员，既没有床铺，又无盖被，下面光垫草，上面只盖皮、棉袍子，苍蝇麋集乱撞。揭开伤员的盖衣，只见骨折伤口和腹部伤口不仅流脓，成堆的蛆粘遍伤口，已有三天无医无药，缺人护理。戴济民当即下定决心，加入红军，把自己医院的药品、器材一起交给红军，自己也在罗炳辉的部队里当医生。

朝鲜有一青年和爱人一起来到苏区工作。青年任第二后方医院支部书记，他的爱人在红色医院当看护（即护士）。因为她语言生硬，态度不温和，伤病员有意见。谢焕辉就把她送回了卫生部，而卫生部即刻又送回医院。后来才知道，他们是朝鲜族，对中国话不熟悉，难免会在工作中产生一些误解，道理讲明了，那位女同志的工作态度也变得

---

\*本文根据谢焕辉《红色医院》一文改编，原载江西瑞金革命纪念馆资料室。



和蔼可亲了，大家也以无产阶级的友爱态度来对待他们，相互之间的感情融洽多了。

解决缺医的问题，除了招募自愿加入红军的当地医生外，还大大吸收作战俘虏过来的敌军医生和卫生学校培养的医务人员。

对敌方的医务人员，俘虏过来后，除了进行政治教育外，在经济上也给予优待照顾他们。薪水高的照原数发给，薪水低的酌情增加，并根据他们的具体情况，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如没有结婚的，帮助他们物色对象，由他们自己恋爱结婚，使他们更安心乐意地工作。在白军，官兵处于不平等的地位，白军军医动辄向伤兵要钱，没有钱不给医，不给药。护理人员不把伤兵当自己的兄弟骨肉看待。红军的“优待伤病兵”政策与白军形成鲜明的对比。

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成立后，卫生部开办了卫生学校。学员紧密结合实际，学以致用。一年学习出来的学生都能参加离断术及病房的一切工作。中央苏区四大名医之一的陈义厚毕业于日本医科大学毕业，曾任过北洋军医总监、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军医处长，“宁都起义”后，组织上把他调到卫生部，具体负责办卫生学校。培养了许多医务人员。

(彭伟整理)

[illegible]

谢焕辉，兴国县茶园乡人。新中国成立后，曾在兴国县人民医院任中医主治医师多年，直至退休。

## 系在腰间的“野战医院”\*

一座医院不管怎么小,也有几十号人吧。但当年在九陇山区,一支游击队的医院却可以系在腰间随身带着。这种医院不仅现在的你我不相信,就连当时“围剿”游击队的白军也不相信。但只要向当地的老人打听,他们就会告诉你这样一个故事:

那是 1934 年秋,红六军团开始西征,一些留下来的革命同志仍在湘赣根据地进行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这些游击战争牵制了敌人的大量兵力,从而更有利于主力部队的征战。在永新九陇山区,有一支令敌人非常头疼的游击队,队长叫李国忠。他长得虎背熊腰,一脸络腮胡子,两只铜铃般的眼睛炯炯有神,并且智勇双全,带领游击队多次打破敌人疯狂的“围剿”。

“队长,有一大队敌军向我们土木岭开过来了!”在山头侦察的小王急急忙忙地跑回来向李国忠报告。

李国忠下床走了几步,看了看已经愈合的伤口说:“这药真是神奇,几天就痊愈了。”随后又问:“他们来了多少人?”

“一百多人,王狗财也跟来了。”

提到王狗财,李国忠气得一拳头打在桌子上说:“这个叛徒,我早就发觉他的革命意志不坚定,幸好没让他知道太多的秘密。这次让我逮着了,我非杀了他不可。”王狗财以前也是一名游击队战士,但参加革命不久,因为山上的生活太艰苦,贪图荣华富贵的他就背叛了革命,成了国民党的走狗。

“传我的命令,准备战斗!”说完,李国忠就带领大家去布置战场了。

而此时,敌军正要翻越土木岭,王狗财一边在前面带路,一边对率队的赖姓连长阿谀奉承道:“赖连长,您这次出征,准能打个全胜,把游击队彻底消灭干净。”

“不是还有李国忠那个又臭又硬的家伙吗?”

“他?哼!赖连长您不记得了?上次他挨了一枪,要不是跑得快,早就没命了。一两百人的游击队,经过几次围剿,死的死,伤的伤,山上一没药品,二没医院,恐怕剩下的就那么三四十个人了,说不定李国忠正躺在床上奄奄一息呢。赖连长,您就等着升官发财吧。”

---

\* 本文选自《井冈山的红色传说》,张泰成主编,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

“我升官发财了,是不会亏待你的!”赖连长拍了拍王狗财的脑袋说。

当敌军走到山下时,忽然听到雷鸣般的喊杀声。赖连长挥手示意队伍停

下来,王狗财赶紧跑上前去说:“连长大人,这是游击队惯用的伎俩,虚张声势,以便掩护他们撤退。”于是,敌军迅速向前推进,果然没有发现任何异常情况。来到一块开阔地,王狗财看到空地上有生火的痕迹,就像狗一样,东闻闻,西嗅嗅,然后对赖连长说:“他们还没走多远,赶紧追。”话音刚落,突然听见一个声音在山中回响“不用追了,我们已在这里恭候多时了。”接着,四面八方响起了噼里啪啦的枪声,李国忠首先跳了出来,接着又出现了一百多名游击战士,打得敌人抱头鼠窜,落花流水。游击队战士乘胜追击,王狗财、赖连长带着一路残兵拼命往外逃。

赖连长像只斗败的公鸡一样红着眼睛,狠狠地给正喘着粗气的王狗财一个耳光,冲着他大吼:“去给老子查!天底下哪有这等奇怪的事,前几天明明看到李国忠挨了一枪,怎么这么快就好了?”接着又对王狗财厉声问道:“你不是说他们没有药品和医院吗?那些人难道会从地下冒出来不成?还不赶紧去给老子查!”王狗财吓得面如土色,连滚带爬地跑了。

过了几天,王狗财就带了一支“清剿队”悄悄地进了山,想一探究竟。他们挨家挨户地搜查但结果非但一无所获,并且在搜查的路上遭到游击队的伏击,王狗财腹部挨了一枪,因为他带的人多,才侥幸逃脱。

回到家后,王狗财就一病不起,尽管吃了不少药,但伤势始终不见好转,伤口由最初的发炎到溃烂,进而一步步恶化。一天夜里,他梦到被地主迫害致死的父亲一边追着他打,一边骂他是个孽障。没过几天,王狗财就死了,他至死都没有找到游击队的医院。

那到底有没有医院呢?其实,游击队不仅有医院,而且不止一所;每个战士都有一所医院,那就是系在他们腰间的布袋,被战士们称做“野战医院”,里面装的是专治枪伤的药品。当有人受伤了,他们就从布袋里拿出药水、药品及绷带等物品进行治疗;由于治疗及时,战士们的伤恢复得很快。从那以后,野战医院的传说在当地广泛地流传开来。

现在,这种被誉为“野战医院”的绿色小布袋保存在湘赣革命纪念馆。今天,在九陇山一带的一些老乡家里,都还可以看到一个布袋,里面装满了药品,据他们说,这些常备的药品功效异常神奇。

(李天兵、吴翔明、欧阳凌收集整理)

## “红色华佗”办医院\*

三国时，据说有位为关羽刮骨疗伤的神医华佗。而在井冈山斗争时期，红军中也有一位吉安籍的“红色华佗”，关于他的传说还得追溯到红军打下吉安城说起。

1930年，十万红军下吉安，顺利地攻占吉安城。当时，中共中央长江局军委书记周以栗患有严重肺结核。因此攻下吉安后，毛泽东急忙到处找大夫，希望能把周书记的病治好。正在这时，红十二军军长罗炳辉来了。他受自己的好友、吉安名医戴济民之托，专来邀请毛泽东前去做客。

罗炳辉对毛泽东说：“戴医生原在上海学医，毕业后回到吉安，开了一个诊所，医术高明，为人正派，在吉安城中很有名望。”

毛泽东一听，高兴地满口答应，并对总前委秘书长古柏说：“你爱人曾碧漪也快要生孩子了，我们也一起去戴医生家做客，我叫子珍一块去！”

他们很快来到戴医生家中。戴医生办了一桌丰盛的酒宴款待客人。席间，毛泽东诚恳地请戴医生帮周以栗治病，并希望戴医生能帮助照顾即将生孩子的曾碧漪。戴医生满口答应，他说：“红军天天打仗，伤病员多，应该多配一些医生，多办一些医院才好。”

毛泽东说：“是呀，我们也想办所医院啊，就是找不到医生。”

戴济民听了毛泽东的话，沉默良久，开口说道：“若不嫌弃，我愿为红军服务！”

毛泽东一听，惊喜地说道：“没想到我今天作客，会得到一位‘红色华佗’。戴医生，我们红军热烈欢迎您！”

“红军那么多的伤病员，必须办一个医院才行啊！”戴济民感慨地说道。

“好，如果戴医生愿意，办医院的事情就交给你了，要人给人，要物给物。”毛泽东满口答应。

“那地点选哪儿呢？”戴济民深思了一会，说道：“要不就选在青原山净居寺，那里风和日丽，僻静清新，是个治伤养病的好地方，而且敌人也不易发现。”

“完全同意。”毛泽东立马对贺子珍说：“这件事情你尽快落实。”

第二天，贺子珍、戴济民和几个红军如约来到净居寺。寺里主持高光听完他们的来意，爽快的答应道：“好啊，红军打仗为人民，受苦不说，理应得到佛祖的庇佑啊！”

---

\*本文选自《井冈山的红色传说》（二），张泰成主编，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

“在宝寺办医院，无奈惊扰了方丈，往后多有不便处，还望方丈海涵。”戴济民说道。

“主持的大恩大德，我们红军没齿难忘，我在这儿代表全军战士向您致敬。”贺子珍举起手，恭恭敬敬地向高光行了个军礼。

过了两天，戴济民携带一些医疗器械和药品，参加了红军，在净居寺办起了红军医院。后来，这所医院迁往兴国县的茶岭，改为红军总医院，戴济民当了总医院院长。

(刘文华、易九桂、吴翔明收集整理)

## 为了信仰\*

革命根据地的医疗卫生干部，一部分靠自己培养，另一部分就是脱离旧军队的知识分子，经过严格考验后逐渐成长为红色卫生工作的骨干。

戴正华是安徽合肥市人，因为保守而富有的旧式知识分子家庭，戴正华接受了良好的大学教育，学习了先进的医学文化知识。

随着知识的丰富，阅历的增长，在当时中国内忧外患的格局下，戴正华深刻认识到：只有武力才能震慑外国侵略者，只有军队，才能力挽狂澜！

和当时许多进步知识青年一样，为了寻求中国的解放，怀着一腔报国热情，戴正华准备参军，凭借着自己的医学知识，为国家做出贡献。那个时候，恰逢在合肥驻扎的国民党军队招兵，于是，戴正华参加了国民党军队。

在国民党的军队中，戴正华因为精湛的医术受到了国民党上层军官的重视，也为他提供了优厚的生活待遇。但是戴正华还是觉得没有找到自己真正的使命，冥冥之中总有一个声音在告诉他，不要安于现在的生活，直到宿命降临！

在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实行围剿的过程中，在一次次与被俘的共产党人的接触中，戴正华对共产党有了更多的认识，逐渐建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当知道了苏区医务人员非常紧缺、伤病员久病难医的情况后，他在国民党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二次围剿时，毅然决然地抛弃了在国民党军队的优厚生活待遇，投入了共产主义的怀抱，参加了红军！

在参加红军的第一天晚上，戴正华做了一个梦，梦见了共产社会的美好蓝图，这，也让他更确信，自己一直在等待的使命就是——参加中国共产党！

最开始，戴正华在红三军团当医生，后来被调到湘赣苏区军区卫生部和后方医院当医务科长。1934年，戴正华跟随的红十七师北出南浔路，威胁南昌，牵制敌人近四十个团。戴正华转战数月，忙碌在战地医院，由于物资匮乏，他只能为受伤的战士做一些简易的包扎和治疗，很多战士，因为伤口感染溃烂不得不截肢甚至死亡！这段时期的戴正华，见证了无数战士为了崇高的信仰，毫无畏惧的牺牲自己。战士的鲜血也感染了戴正华，使他的革命信仰愈发坚定！经受住严酷的考验，他的坚持得到了组织的肯定，同年，

---

\*本文根据彭方复、谭尚维《湘赣军区、红六军团医务工作的回顾（一）》中“红军卫生干部的来源”一文改编，原载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后勤工作·史料回忆》（1），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

后来，红军主力长征。极端困难的长征路上，险恶的环境和缺医少药的困境严重威胁着部队。戴正华迎难而上，组织医护人员为红军战士看病，为部队筹集医药。即使条件艰苦，戴正华也严格要求工作，精心诊断治疗伤病员。他的医术高明，在部队里很有名望，治疗过红军中的许多高级干部和病危伤员，为革命做出了重大贡献。

[illegible]

59

## 傅连璋接生\*

中央红色医院成立后，傅连璋白天讲课、医治伤病员，晚上编写讲义。

一天夜里，他正在医院编写讲义，突然有个叫毛焕章的老乡提个马灯进来了。

“傅医生，你快去救救我老婆吧！”他一见傅连璋，便急得要哭地说。

“你老婆怎么了？”傅连璋急问。

“生孩子，请了个接生婆，一天也没生出来，血流了一床。”毛焕章说。

傅连璋马上拿起药箱，带上接生用具，说声：“走吧！”立马一口气跟着他冲了一里多路，到了毛焕章的家。

进去一看，他老婆脸色刷白，嘴里不断地呻吟着。傅连璋随即娴熟地做准备，马上洗了手，带上橡皮手套，让毛焕章点起一盏煤油灯，仔细地检查，发现接生婆把产妇的子宫弄破了，因此出血不止。经过努力，孩子总算生出来了，是个女孩，又白又胖；傅连璋随即用手捏住伤口，缝好了。大人孩子都脱了险，全家人都非常高兴、非常感激。

全国解放后，傅连璋接到了一封信，信内附有一张照片，照片上有十二个人，是张全家福，上面有一对老夫妇，还三个年轻妇女，七个小孩。原来这封信是毛焕章写来的，照片上的老夫妇，就是他和她老婆；三个年轻妇女中，有一个抱了个小娃娃，那就是那次接生的他们的第一个女孩子，那个小娃娃是她的孩子，其他两个年轻妇女和六个孩子是他们后来生的儿女。毛焕章至今还记着当年的中央红色医院，还在信上谈了很多感激的话，感谢傅连璋救了他一家人。

(郭良整理)

[illegible]

毛焕章 ( 1896-1966 ), 福建汀州长汀人。土地革命时期, 曾为红军印过大量宣传品。1933 年夏将印刷机器全部送给团中央局, 成立《青年实话印刷所》。后举家随所迁往古城大井头和瑞金石门, 工作至红军长征前夕, 奉命送家小返汀, 后被疏散到漳州避居。1950 年秋被选为省工农兵劳模代表。1953 年任上海虹印七厂当保管员。

\*本文根据傅连障《中央红色医院的成为》一文改编，原载傅连障著《在毛主席教导下》，作家出版社1959年版。



## 战场救护滕代远\*

1931年1月2日，谢新亭等人所属的红七军在邓小平和张云逸带领下，决定放弃攻打桂林、柳州等大城市的冒险计划，去中央苏区与毛泽东、朱德的红军会合。经过多次战斗，在付出巨大的伤亡代价后，红七军最终东渡赣江，与中央红军会师于兴国县桥头乡。这就是历史上悲壮的七千里“小长征”。

部队到达桥头乡时只剩三千余人，但个个都是革命精英。他们精神抖擞，编入彭德怀、滕代远领导的红三军团，并迅速投入了第三次反“围剿”战斗。

高兴圩北面战场上，枪炮声此起彼伏，厮杀声响彻山谷。

谢新亭待在绷带所里，看着一个个伤病兵从战场送过来，异常的紧张。“新亭过来，给这个轻伤的兵包扎下”，一个医生喊道，“新亭，把这个伤兵的伤口处理下”，谢新亭满身是汗，忙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在绷带所来回穿梭。

这个时候，一阵急促的声音传来：“医生快来，我们政委受伤了”。谢新亭寻声抬头望去，只见两人抬着副担架跑进了绷带所，一个背着把枪的战士一手扶着担架，一边喊道：“快，这是我们三军团的政委，把你这里最好的医生叫来”战士几乎哭着喊道，但语气带着不容违抗命令。

谢新亭为难了，谁是最好的医生？当时，部队伤亡非常大，战场救护工作任务很重。可是，部队医务人员很少，连医生、助理医生都是临时培训出来的，医疗设备也很差。他所在的五师十三团卫生队四十人左右，其中仅有医生二、三人，助理医生五人，看护兵八人，其余的全是担架兵和勤杂人员。

不知所措的谢新亭足足楞了好几秒。

“小鬼，你给我治就行”，滕代远用微弱而沙哑的声音说道。

平时，不管在怎样困难的条件下，卫生队的上下官兵也从不畏缩，始终在最前线舍生忘死地抢救伤员。可是这位是政委，是我们红三军团的政委呀，谢新亭犯难了，怎么办？他有点束手无策了。

“没事，小鬼，你给我把伤口擦点盐水消消毒，包扎下就行”，滕代远语气很低，语速很慢，和蔼亲切。

---

\*本文根据谢新亭《忆红三军团战场救护工作》一文改编，原载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编《创业维艰——回忆红军时期的卫生工作》，中国人民解放军出版社1983年版。

谢新亭这时才慢慢的给伤员检查伤口。伤员右肩烙着深深的弹孔，鲜血渗透他的上衣。谢新亭以最快的速度给伤口消毒，并包扎好。他如释重负，深深的松了口气。

“小鬼，你叫什么名字”，滕代远微笑着问。

“谢新亭”，谢新亭忐忑地回答道。

“你干的不错，我们要多培养像你这样的技术高超医生，更好的服务革命。”

说完，滕代远消失在绷带所，往前线方向走去。轻伤不下火线，可是政委是重伤呀，谢新亭正欲喊政委回来，可早已看不见他的身影了。

谢新亭凝望着模糊了的不远的战场，山峦起伏，叠叠障障，不由的在心头里刻上“努力学习，真心为民”几个大字。

(陈水清整理)

[illegible]

滕代远(1904-1974),湖南省怀化市麻阳县人,中国工农红军早期创始人,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领导者之一,还是新中国人民铁路事业的奠基人。

谢新亭（1904-1993），广西人，时任红七军医务兵。

## “大金刚”李治妙手救周恩来\*

李治原名李守镜，江西永新人，毕业于上海南洋医科大学，曾是张辉瓒的十八师六团上尉军医，在第一次反“围剿”战斗中，参加红军。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李治带着几名卫生学校学员到干部休养连工作，不久后被任命为干部休养所医务主任，负责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的疾病治疗和保健工作。

红军长征到达毛儿盖后，由于营养缺乏，又过度劳累，周恩来病倒了。他连续几天高烧不退，昏迷说胡话，面黄肌瘦，吃了些药也不见效。红一军团卫生部医务主任戴济民经过检查得出了“患痢疾”的结论。虽然戴济民医术高超，但是大家依旧不能接受，为了进一步查明病因，毛泽东找来红军卫校的教育长李治，请求李治诊治。

李治坐在周总理床边，小心地掀开总理的被子，查看了四肢皮肤。拿出体温计，测了一下体温，体温达40摄氏度。触诊肝界，肝肿大在四横指。若有所思的看着周总理好一会，接着转过身来对大家讲：“周副主席的病不是痢疾，我怀疑是肝病，我想找王斌来进一步确诊”。外科大夫王斌为周总理进行诊断，最后和李治一致认为周恩来患的是阿米巴肝脓肿，且已严重发炎化脓肿胀。

“必须马上进行手术，这是最佳方案”，李治说：“可是我们根本不具备手术条件”，连同的一个医务人员说。当时红军缺医少药情况十分严重，连基本的手术器械都很难凑齐，“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焦急的神态爬满了屋子里每个人的脸，大家相互对视着，一眼看去凝重的眉显得尤其突兀，仿佛向对方祈求着什么。这时李治站起来，深吸一口气，说：“我有一个办法。”“什么办法？”大家立刻看向李治，就好像他知道了宝藏的巨大秘密。“穿刺引流，就是依靠人自身的推动力，让脓肿烂穿横结肠，让脓液自然流到结肠内排出体外。”李治解释道。其中一位同事说：“我们的注射器针头这么短，根本无法穿刺，并且如果穿刺不成功反而适得其反，可能引起大出血的不良的后果”。

李治何尝不知道穿刺的利弊，自己也没有绝对的把握。但是眼前的条件容不得他选择，病情如果不立刻加以扼制，尽快治疗，就会危及生命。最后请示毛泽东和周恩来本人，同意李治的办法。李治先用尚存的治痢特效药易米丁治疗，同时继续用冰块冷敷肝

---

\*本文根据冯彩章，李葆定《中央苏区四大名医：李治》一文部分内容改编，原载冯彩章，李葆定著《红医将领》，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年版。

区，引导炎症向下发展，便于穿孔排脓。李治手持针柄，紧张得透不过气来，然后深深吸一口气，找准部位后一针扎进去，抽出许多脓液。由于没有麻药，周恩来躺在行军床上以惊人的毅力忍着剧痛，额头渗出豆大的冷汗，直到疼得昏厥过去了。做完无麻药肝穿刺引脓手术，李治又上山采中药给周恩来服用，以彻底解毒养肝。李治陪在周恩来床边，连续十四五小时的不断冷敷，周恩来逐渐清醒过来，只见他一边呻吟，一边喊肚子疼。他大便时排出了大量脓水，随之体温也开始下降，终于转危为安。

下一步是给周恩来加强营养，增强抵抗力，以免感染其他疾病。可是长征路上，到哪里去找有营养的食物呢？恰在这时，李治发现行军路过的田里种的许多豌豆。于是他边走边摘了一些豌豆角，到了宿营地，就煮了一锅让周恩来吃，这样周恩来的身体渐渐好转了，虽然人不强壮，但是可以不做担架了。不久他便高高兴兴的离开了休养所，到前边指挥红军去了。

周恩来事后称赞李治是位“医技高超，胆大心细的军医”。李治医名传遍全军上下，人称“大金刚”，意思是指他医术高明，有起死回生的法力。

(刘淑娟整理)

[illegible]

李治 ( 1899-1989 )，江西永新人。1930 年参加红军，先后任红一方面军第四、第一红色医院医务主任、院长，中央军委卫生学校教员、教育长、校长等职。中央苏区四大名医之一。长征时，李治任中央干部休养所医务主任。

## 精心安置伤病员\*

在长征路上，红军频繁地同敌人作战，受伤人数很多，自然条件恶劣。人员受疲劳、水土不服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发病率也极高，红军在脱离根据地的情况下转移，没有后方医院可以收治伤病员，为了摆脱敌人的追兵，对付敌人的毒计，需要轻装快速前进，那伤病员怎么办？

长征期间红三军团卫生部对所属部队预防疾病的工作是抓的很紧的，卫生部曾对行军宿营卫生制度做过规定，并针对变化的情况及时提出防病措施：在翻越雪山时提出预防高山病和冻伤的措施；在过草地时又提出了预防有毒野菜与蘑菇中毒、预防下肢溃疡的措施……行军中团卫生队的医生总是首先跟随团委、前卫联系，然后从前卫连到后尾连，一个排一个排甚至一个班一个班地插进去了解发病情况，中间休息的时候就利用这个空隙进行卫生教育和开展治疗工作，个别师团卫生机构还十分注意对连队卫生员的培养教育，经常给他们上卫生课，使他们能逐渐提高卫生防疫技术，在连队卫生防病中能真正起到骨干作用。

红军药材十分缺乏，医务人员少，而且大多是没有经过系统训练的，都是在工作中边干边学培养出来的，要是伤病员早日恢复健康，这在当时的确是一件不容易的事。面对这些困难条件，红军卫生人员并没有气馁，而是迎难而上，大家心中有一个共同的想法就是要尽最大的努力，解除伤病员的痛苦，使他们能尽快投入到战斗的行列中。同志们经常在一起互相商量研究治愈伤病的办法，因陋就简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条件为伤病员治病：缺乏治疗外伤的药物就用食盐水冲洗伤口；没有甲板固定骨折就以树木竹片自己制造；没有纱布和棉花就撕被子作敷料，医护人员的被子撕掉了睡觉时没有盖的，就钻入草堆以稻草御寒；对内科病人，如痢疾患者没有抗生素治疗，只好采用服盐水的方法，补充迅速丧失的体液；他们还常常向当地的老乡学习，用中草药知识采集一些草药为伤病员治病。

在克服药品不足的困难的同时，他们还抓紧医护人员的培训工作，使他们能逐步提高业务水平。长征中红三军团卫生部曾设有一个军医训练队，教员主要由孙根华和刘放，学员有杨庆堂，熊志坚，何梦烈，许先为，黄真等十九位同志组成，那时训练医务人员

---

\*本文根据饶正锡《长征时期红三军团卫生工作片段》中“伤病员怎么办”一文改编，原载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编《创业维艰——回忆红军时期的卫生工作》，人民军医出版社 1983 年版。

比在中央根据地更为艰苦基本上没有教材和教具，讲课的时间完全是见缝插针，都是利用行军中的休息和宿营的空隙时间进行的，但是就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学员的教学积极性和学员的学习热情都是很高的，教员们除仔细备课，注意教学方法外还经常顺路到学员中去辅导学员们，而且为了督促大家学习和检查学习情况，还常常进行测验，公布分数，基层卫生人员的学习干劲是很足的，谁也不甘心落后，常常都能取得很好的成绩，就这样他们不断克服药品和技术力量不足的困难，使许多伤病员迅速转危为安、逐步康复。

往老乡中安置伤病员需要做很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在那个年代，地主土匪横行，国民党的军队也四处追杀红军，长征路过的地区不同于根据地群众，对红军还不是很了解，加上国民党的反动宣传，还有人对红军怀有恐惧心理。在这种情况下离开部队到老乡家中去养伤，确实有许多困难甚至是很危险的，因此有许多伤病员哭着不愿意离开部队，但是红军要迅速转移，又实在带不走那么多伤病员，把一部分重伤病员分散到可靠的贫困老百姓家中治疗，这成了当时迫不得已的办法。

许多时候，部队要连续作战，分散伤病员的工作往往要求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做好做这项工作，而且还需要隐蔽，否则若被当地的民团和别的反动派知道了，不但伤病员有生命危险，接收伤病员的老乡也会受连累。具体做伤病员安置工作的主要是政治部门和卫生部门，通常的做法是白天调查民情寻找可供安排伤病员的贫困老百姓家，并做好接收伤病员的老乡和伤病员本人的思想工作，在夜间把伤病员抬到老乡下安置，为了解决伤病员的生活和医疗问题，避免照顾伤病员而过多地加重老乡们的困难，往往要留下若干银元和医药用品或送点打土豪收没来的衣物布匹等。

长征路上，在红三军团卫生部门工作的同志们，尽管遇到了极大的困难，但他们没有被困难吓倒，而是以坚强的革命意志战胜了各种艰难困苦，较好地完成了预防疾病、医治伤病员等多项任务，为夺取长征的胜利做出了贡献。他们的革命精神永远值得我们怀念，值得我们学习。

（刘寅整理）

## “姜太公”疗伤\*

1927年9月9日，张宗逊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任中国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第1团2营6连连长，三湾改编后改任团部参谋、副连长。因为作战勇猛，足智多谋，被毛泽东称作姜太公。

三湾改编后，秋收起义部队向井冈山进军，1927年10月23日拂晓，部队遭到反动地主武装肖家壁部的袭击，被迫撤离大汾圩。1927年十一月中旬，工农革命军下山攻打茶陵。当部队向茶陵县城前进，途径坑口村时，部队同少数地主武装打了一仗。不幸的是，张宗逊负伤了。据张宗逊自我描述，伤势并不算太重，但不能行走，只能依靠牲口移动。在这种情形下，显然有掉队的危险。而张宗逊却认为，这是一件天大的幸事！

秋收起义时的伤病员，没有随军医疗的条件，被迫安置在老百姓家中，而大多数的伤病员在行军转移途中掉队失踪。只有当时有条件的负伤干部能够被送回家疗养或到城市就医，发给他们足够的费用，尽量想方设法将伤病员们送出去安置。因为只有去治疗，命才能够被保住！

而他选择了随军医疗，尽管医疗条件十分的差，连正式的医生也没有，只有两名在长沙医院做过看护的同志负责部队医疗工作，但他们也只会给伤员上药，药品也少的可怜，更没有算得上是医疗器械的器械，但是张宗逊仍然坚持随军转移。没有器械，这两名医护人员只能用竹签来代替探针上药，他们也不懂得如何遵循严格的消毒方法，虽然每天为张宗逊上药，换纱布，可是张宗的伤口仍不见好转。后来，队员们找来了一个江湖中医为张宗逊治疗。江湖中医没什么本事，说用鸭毛最干净，用冰块敷一敷就好了，满口吹嘘。经中医的一折腾，张宗逊的病情非但没有好转反而更加严重了。直到十二月中旬，国民党反动派军队攻打茶陵，面对敌强我弱的局势，为保存实力，我军在第一天傍晚选择退出茶陵，并将张宗逊转送到工农革命军设在宁冈县茅坪的医院安置。茅坪的医院是我军建立的第一所红军医院，医院规模小，医疗器械缺乏，充其量只是把伤病员集中起来治疗的一个点。随着战争次数的增多，伤病员也越来越多，考虑到茅坪的医院规模较小，后来在小井修建了一个更好的医院。张宗逊心想：这个医院才像个医院，才像这么回事。

---

\*本文根据《张宗逊回忆录》相关内容改编，解放军出版社20018年版

当时，茅坪医院里有几位井冈山本地的好中医。于是找来为张宗逊治疗，他们自己在山上采集的中草药给张宗逊治疗，将草药敷在了伤口，脓血很快被吸了出来，再换上了一一种土膏药，贴敷，不久，张宗逊的伤口痊愈了。

就这样，几经周折，最终，张宗逊的伤口痊愈了。随着斗争形式的加重，敌军的猛烈攻打，张宗逊又立刻投入到紧锣密鼓的战争中去了。

(张威 王友文整理)

[illegible]

张宗逊(1908-1998)，陕西渭南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国上将，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红军连长、副支队长、师长、军长、红一方面军红军大学校长兼政治委员、红军中央纵队参谋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担任第一野战军兼西北军区副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济南军区副司令、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等职。



## 赖芳盛舍命救护伤病员\*

1934年2月，钟家瑶在信康县任少共县委巡视员。因为信康苏区大部失守，连日行军作战，再加上天气寒冷、春雨浇淋，钟家瑶得了重病。于是，他和挺进队连长刘义才，战士钟桂春，在庵山住了一个多月，直至病愈。庵山只是一个只有三户人家的山区小村，他们被安排在赖芳盛家里。这时赖家的“谷仓”里仅有一担半谷子。赖芳盛把这点谷子碾成米，每天确保三个伤员吃上两餐红薯粒加米饭稀粥，他自己只好用红薯、芋头充饥。

钟家瑶伤势特别严重，经常腹部疼痛难忍，腿部的伤口红肿流脓。为使他的伤口尽快好转，赖芳盛常常翻到后山采草药，并想方设法增加钟家瑶的营养。在他的悉心照料下，钟家瑶等三个伤员的病情渐渐有了好转。这里虽说是一个并无多少人知道的座落偏远的小村子，可是险情还是发生了。一天，“铲共团”突然来搜查，刘义才和钟桂春迅速冲上屋后山上躲藏，钟家瑶由于病重走不动，只好躲在赖芳盛家的小楼上，楼上放着几只水缸，他跳进一口小缸里，水缸太小，不能躲藏，又跳进另一口大水缸，还是藏不住，急得团团转，后来只爬进谷仓顶上的空隙躲起来。这时，他猛然摸到身上还带有一枚登贤县苏维埃的长条形公章，心想，这枚公章无论如何不能让敌人搜去。于是赶忙将它从身上解下，顺手将它塞在瓦梁下面的砖缝里，并做了记号。“铲共团”搜查了一番，没有发现任何异常后就匆匆离开了。为了安全起见，赖芳盛便将他们三人带到屋后的一座大山，隐蔽在一个岩洞中。赖芳盛为了让他们早日病愈，冒着生命危险，经常给他们送米送菜送草药，由于他的悉心照料，钟家瑶他们逐渐病愈了。

清明节后，赖芳盛不顾敌人的严密封锁，冒着危险领着他们到安远的塘村一带寻找游击队。后来，赖芳盛收留红军伤病员的事情还是被“铲共团”发现了，“铲共团”就抄了他的家，并威胁他说出红军的下落，但是赖芳盛宁死不屈，用生命保护了红军的安全。

(陈水清整理)

[illegible]

钟家瑶，原登贤县苏维埃政府主席。

赖芳盛，原庵山村贫协委员。

\* 本文根据中共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江西党史资料》（第十一辑）相关内容改编，1989年版。

## 艺高人胆大，志坚病魔除

红军到黑水、芦花一带的藏区时，已经绝粮断粮了，总部下令在此地区休整筹备粮食。一方面受国民党军队的恐吓和欺骗，另一方面受到当地反动派以及地主恶霸的控制，当地藏民均已逃避一空。红军筹粮工作成了艰巨的任务。

为了按时完成筹粮的任务，时任红八军政治部宣传大队长、红三军团连政治委员杨勇政委率领团直属队和警卫连，机枪连等到离芦花四十里以外的地区去筹备粮食。到达目的地村子之后，红军发现村民都已逃走了。杨勇政委只好率领战士们亲自收割已经成熟的青稞麦，红军割一块量一块，一亩地付给粮钱大洋两元。

上午九点，值班员吹响了休息的哨子。大家纷纷停下来休息喝水。正在这时，远方射来四发冷枪子弹，有一发正中机枪连司务长刘阳的大腿内侧，流血不止。急忙赶来的卫生队刘医生用探针一探，可以触到子弹头。子弹还留在股骨之间，进口很小，流血很慢。经过检查，刘医生发现子弹未伤及大血管，也未伤及骨头和神经，伤员还能忍受，但已经无法行走了。机枪连长紧派了四名战士把刘阳抬到了卫生队。

卫生队的医生们立即开会决定治疗方案。司药长认为卫生队没有麻药、沙布等，不适合进行手术，应该将伤员送军团卫生部。但曹指导员认为，将伤员送往团卫生部太危险，不仅路途遥远，而且在护送途中随时可能遭到敌人的袭击。刘医生也认为不应送伤员去军团卫生部，他说，伤员留下治疗是更好的选择。没有麻药，可以用政治思想工作代替。而且伤员伤得并不很重，只要在手术时要严密消毒，伤员最早十天便可痊愈。最终，刘医生的意见得到了大家的支持、卫生队的曹指导员亲自给刘阳做思想工作，给他讲明手术的必要性和卫生队的缺药困难。刘阳听后，同意了卫生队的治疗方案。

当时的卫生队既没有沙布也没有手术刀，只好用白布条和剃须刀代替。手术过程中，卫生队的刘医生熟练地割开皮肤，清除腐坏肉，取出子弹，再缝合伤口，整个过程一气呵成，仅用了十五分钟。由于没有麻药，刘阳在手术过程中痛得满身出汗，虽然很痛，但手术过程中没有叫唤，也没有乱动，以极大的毅力忍耐着。

手术后，刘阳仅用了七天就痊愈了。机枪连的连长和指导员还亲自到卫生队致谢。

## 舍生忘死的收容队\*

红军长征队伍中有很有一部分是在收容队工作的医务人员。收容队的任务是给掉队的同志治疗，设法安置和收容重病号，任务不轻不重，却不可或缺。

一天清晨，收容队收到消息，敌人将要路过红军驻扎的营地。但营地里大部分都是伤病员，只有几名收容队的卫生人员。

“队长，怎么办？”，小陈慌了，手足无措。

“冷静，敌人暂时还没有发现我们，先等等。”队长周玉生是一名老红军，有经验，不怕事，脸上的胡茬和皱纹告诉我们他有五十多岁。

没有人敢再出一丝声息，敌人的脚步声已经在耳边窸窣窸窣地越来越大，越来越刺耳，但小陈还是能清楚地听见自己突突的心跳声。敌人穿过灌木和杂草的间隙，被踩碎的野花陷入清晨松软的泥土中。

小陈从卫生学校学习一个月就随部队出发，此后就一直跟着周队长四处游击作战。

敌人行军过程懒懒散散，仿佛一条长蛇。周队长的关节炎又犯了，加上露水打湿了全身衣物，开始疼痛发作。周队长紧锁眉头，依然一动不动地牢牢地盯着行走的敌人。不知什么原因，有个敌人急匆匆地朝他们跑来，小陈拽紧拳头，打算就此一搏。周队长看了看小陈，点了点头，同时用冻得红肿的手将大刀握得更紧了，就在他们将要一跃而起投入战斗时，那个白军停了下来，迅速解决后又跑向那条“长蛇”。大家都松了口气，“大蛇”还在继续蠕动。

等到蛇尾的最后一个敌人走远后，周队长脸色苍白，但是现在还不能点火，只要一冒烟，刚刚过去的敌军就会发现这里藏着红军。

有一天，周队长病了，而且十分严重。三天后，周队长没有醒过来，临走前，他给小陈留下一句话：再大的疼痛，也没有看着自己的战友死在自己眼前的时候最心痛。我走了，你不要心痛，不要掉眼泪，男子汉可以流血，但不能轻易掉眼泪。

第二天，收容队去寻找红军大部队，在他们身后，又多了一座矮矮的坟，多了一具献身革命的忠魂。

---

\*本文根据周玉明《红军卫生工作散记（二）》一文改编，原载沈阳医学院史编纂委员会编《红色医生的摇篮》，辽宁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

随行的卫生人员是很辛苦的，长征途中战士有的受伤、有的生病、有的腹泻；当大家休息或到宿营地时，他们就要为伤病员治疗，此外还要检查卫生、挖厕所，走时还要埋粪坑。

部队过了大渡河，可能与水土、饮食有关，大家普遍泻肚子。一闹肚子，整个人就会无精打采，有时候还会没有粮食入肚。前面还有茫茫草地要走，战士们只想前进，不想后退，便只好向当地居民求助。然而，当地藏民因为误信反动派谣言，不是跑光了就是对他们心存敌意，根本不对他们施以援手。战士们只好把青稞麦用火烧了，然后搓一搓再吃，便是最好的一顿饭了。有时候实在饿得体力不支了，他们就吃树叶、草根。

虽然这样艰苦，但是他们每一个人都清楚地知道革命的事业是人类历史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了这样的事业付出他们的全部精力乃至生命也是值得的。所以，革命信念不动摇，就不怕疼痛，把自己交给了革命，交给了党。

革命精神就是粮食，红军战士情绪高昂，经常一边走一边唱：

“行行行，  
草地中，打起劲，  
不怕困难，  
奋勇地向前进。  
敌人骑兵不可怕，  
趁着密集来打他；  
目标越大越好打，  
排子枪快放一射杀，  
我们打垮它！消灭它！  
我们打垮它！消灭它！”

越唱情绪越高，歌声此起彼伏；雄壮的歌声，震撼着山谷！

（彭伟整理）

## 看护班小任\*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离开了江西革命根据地，经过两个来月的战斗行军，进入了湘黔边境。贵州的冬季，正像人们所流传的那样“天无三日晴”，成天阴雨绵绵，很少能见到晴天。

到达贵州黄坪县的那天，部队十分疲劳，大家还未等到开饭，就都躺下准备睡觉了。时任三军团卫生部看护班长的邹顺刚躺下，突然听见一句响亮的声音：“报告班长同志，我归队了！”邹顺连忙坐了起来，原来是班里的小任回来了。这时，班里的其他同志也都围了过来，刚才的倦意一扫而空，大家热情地拉着小任坐下，问长问短，都急于想知道他是如何完成任务归来的。

小任把背包放下，一屁股坐在背包上就说开了。他说：“因护理的病人发高烧、头疼、眼发花，全身无力走不快，我只得搀扶着他慢慢地走。昨日一整天尽和山谷打交道，陡峭的山谷更增加了我们行进的困难，走上几步就累得气喘吁吁。本来我们就走得慢，再加上走一会还得休息、喝水，很快我们就和部队失去了联系。”他停顿了一下，接着说，“当时我心里很着急，盼望能很尽快地赶上部队，只顾走呀走呀，不知不觉夜幕已经降临了，这时天下起了绵绵细雨，伤员也已经被病折磨得筋疲力尽了。我看着他那样子，心里既害怕、又着急，暗想今天是不能再走了，得赶快找个地方宿营。然而我抬头一看，四周一片黑茫茫的什么也没有，一阵忧愁不觉涌上了心头。正在我焦虑之时，猛然间发现路旁有一个观音庙，于是我们走了进去。”

“阴沉沉的小庙里，什么也看不见，只能摸索着前进。进庙后，我拾起了一堆柴烧起了火，然后用茶缸烧开水，用脸盆给病号煮稀饭。待病号服药和吃饭后，我们就围着火堆休息了。第二天，天刚破晓我们就都醒了，病号说他昨晚睡觉出了一身汗，现在轻松多了，于是我们打起行装又出发了。走了二十来里路后，我们便发现沿途的村落有住过部队的迹象，于是我们加快了行进的步伐。大概到正午时，我们发现前面有几个人，赶上去就问：‘喂！同志，你们是哪个部队的？’他们回答，我们是军团直属队的收容队。接着他们反问，‘你们是干什么的？’我说我是军团卫生部跟病号的。听说我们是军团卫生部的，他们十分亲切的说：‘小鬼，照顾好伤员，快走，离部队不远了，今天部队在黄坪宿营。’听到这里，我们高兴地跳呀！走呀！很快就到达了目的地，赶上了部队。”

（赵紫薇整理）

---

\*本文根据邹顺《小鬼看护班二三事》中“报告班长！我归队了”一文改编，原载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编《创业维艰——回忆红军时期的卫生工作》，人民军医出版社1983年版。

## “小鬼”看护班温常声\*

中央红军到达滇东南后，要抢渡长江上游天险金沙江，金沙江以南地区地形错综复杂，犬牙交错，每天行军都是沿着蜿蜒曲折的高山峻岭前进，翻山越岭，前进十分困难。这时我们干休已经收容了二十多名伤病员，其中以重伤员居多，需要大量的担架。军团卫生部从江西出发时，有一个一百五十多人的担架队，但到达金沙江畔时已减员剩下不多了。动员民用担架吧，由于国民党的欺骗宣传，老百姓中的青壮年均已逃散，实在无法携带这么多的重伤员随部队前进了。

为了使重伤员能够得到一个相对安定的环境休息和治疗，组织上决定把重伤员寄居在当地的群众家里。按照上级的布置，从小鬼看护班抽出了温常声等几人留下来，在政治干事的协助下完成安置伤员的任务。为了防止地方反动民团的报复，上级要求原则上不要太集中，一定要分散寄居。因此他们分头翻山越岭寻找合适的群众做好工作，并给伤员留下足够的粮食、药品及几块光洋，以减轻群众的负担，他们就这样一个个把伤病员安排妥当后，才去追赶部队。

温常声同志是当时班里最小的一个战士，是个优秀的共青团员，个子虽然不高，但身体壮实，从未生病、掉过队。他精力充沛，而又精干，工作起来干劲十足，能吃苦耐劳，曾多次顺利地完成了上级交给的各项任务。但这次他在完成寄留伤病员的任务后，却再也没有跟上部队。队员盼望能早日见到他。然而他却一直没有回来。后来队员们才听说，他在追赶部队的途中因掉队被土匪杀害了。当班长得知此事后，热泪不由地夺眶而出，内心非常难过。多么好的同志呀！多么好的战友呀！班长怀念你，战友们怀念你，卫生部的首长和同志也十分怀念你！

（赵紫薇整理）

---

\*本文根据邹顺《小鬼看护班二三事》中“怀念一位失去的战友”一文改编，原载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编《创业维艰——回忆红军时期的卫生工作》，人民军医出版社1983年版。

## 长征中的卫生员\*

在漫漫长征路上，红军长途跋涉。他们不仅要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追击，还要挑战那些荒无人烟、气候恶劣的自然环境，因此在行军途中部队伤员很多，此时此刻，医务人员的重大作用突现出来。为使伤病员能够得到及时的治疗，医务人员经常奋不顾身地抢救、包扎伤员，他们将不能随军行动的伤员妥善地安置在群众家中，对能够随军行动的伤员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悉心照顾。

对随军行动的伤员，医务人员还要克服各种困难进行治疗。每副担架至少需要三个担架兵及医务人员，他们不仅要负责抬着伤员行军，还要带上自己的行囊和米袋。因此，经常出现大部队已经到达宿营地，而担架队还远远的落在后面的情况。医务人员望着远处部队宿营地的篝火，虽说他们早已精疲力尽了，但此时也不能休息，因为他们不仅要赶上大部队的步伐，还要时刻注意伤员病情的情况。好不容易赶到宿营地，他们依然不能安然地去睡觉，因为他们心里还是在考虑伤员的情况。在帮伤员换好药后，然后他们自己才去找饭吃。因此，他们的睡眠时间都严重不足。

长征途中，卫生保障工作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行军中，医务人员都要提前设立好茶水站，或者准备些凉水，滴一些消毒液，起消毒及预防的作用。为全力保障战士们的安全，当时卫生部门就对部队做出来严格的要求：凡是条件允许时，医务人员都要督促战士们洗脚，碰到有些行动不便的伤员时，医务人员也常常尽力帮助他们。不仅如此，在宿营地里，医务人员还要为战士们熏蚊子、挖厕所。这样做，既讲卫生，又维护了群众纪律。

长征路上，敌人前堵后追，红军战士奋勇拼杀。医务人员面对极度困难的治疗条件，也一直不辞辛苦，依然坚持用自己最大的能力去救治每一位伤员。

（李梦圆整理）

---

\*本文根据彭方复，谭尚维《湘赣军区红六军团医务工作的回顾（二）》一文改编，原载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后勤工作·史料回忆》（1），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

## 战火催生红色卫生\*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经“三湾改编”后的秋收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建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1928年4月，朱毛红军会师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一步发展壮大。

在艰苦卓绝的井冈山革命斗争中，毛泽东逐步认识到发展医疗卫生事业的迫切性。在《井冈山斗争》一文中，毛泽东提出：“建设较好的红军医院，是巩固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条件之一，是边界党应该努力的。”1928年5月，红四军军委决定在茨坪建立“红光医院”，后来改名为“小井红军医院”，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所正规医院。由于经费奇缺，红军官兵们纷纷将平时发的伙食尾子募捐出来，军民们就地取材，自己动手建设医院。小井红军医院自建立起，就严重缺乏医生、药材和医疗器械。医生与护理人员只好采集各种草药用于治疗，用竹子制作各种手术用具。尽管条件极其艰苦，红军医院在收治红军战士的同时，仍收治了很多俘虏兵，这所医院也成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军民健康的保障。

1929年1月，国民党军队对井冈山根据地发动第三次“会剿”。为摆脱敌人的包围，红四军前委决定“围魏救赵”，主力向赣南、闽西撤退，后开辟以瑞金为中心的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

在中央苏区创建和发展的过程中，军队的卫生工作得到了较好的发展。在1929年12月28日古田会议中，毛泽东指出：“全军各部队卫生机关不健全，医官少，药少，担架设备不充分，办事人少与不健全”“全军政治机关对伤病兵注意不充分”“重伤重病兵给养和用费不够”，红军医院存在无组织状态，医官、看护兵太少，饮食恶劣等问题突出，因此把卫生工作也列入了决议内容。古田会议的卫生决议，确立了卫生工作的新原则，制定了优待伤病兵的具体措施，明确了人民军队卫生工作的性质，摆正了卫生工作的方向，对军队卫生工作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扩充医疗卫生人才成了亟待解决的问题。红军设法广纳人才，积极动员当地医生加入红军，服务军民。1929年3月14日，红四军进占福建长汀县城，毛泽东、朱德等红军领导人与福音医院院长傅连璋建立了联系和友谊。傅连璋曾救治收

---

\*本文根据戴正华《苏区时期的卫生工作组织情况及一般方法》一文改编，原载高恩显、高良等主编《新中国预防医学历史资料选编》（1），人民军医出版社1986年版。



留南昌起义部队伤病员，亲自为陈赓、徐特立等 300 多名伤病员治疗过，不仅医治红军伤病员，还主动为红四军全体官兵每人接种牛痘。福音医院也从此成为一所不挂牌子的红军医院。

1930 年 10 月 4 日，红一方面军攻克吉安城，毛泽东亲自登门拜访吉安城名医戴济民，并动员他携带所有的药品器械加入红军。此后，红军创办了红军总医院，戴济民任院长。1930 年 12 月第一次反“围剿”时，张辉瓒部中了红军的伏击，国民党医官李治被俘，之后参加了红军，在红军第四医院任军医、医务主任，同年 8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李治调任红军第一医院院长。在反“围剿”作战中，医院设备简陋，药品奇缺，李治负责救治负伤的 1000 多名伤员，并为负重伤生命垂危的罗瑞卿做手术，挽救了罗瑞卿的生命，从此名声大震。1931 年春，中共中央又给中央苏区派来了贺诚、彭龙伯（彭真）、陈志方等医务人员。

红军医务人员的增多，为卫生管理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提供了可能。贺诚来到中央苏区后，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于 1931 年四、五月间成立了军委总军医处，贺诚任处长，专门领导红军的医疗卫生工作。苏维埃中央政府成立后，红军和苏区的医疗卫生事业加快了发展步伐，1932 年 10 月，中革军委决定将红军总军医处改为红军总卫生部，由贺诚任部长兼政治委员。红军中军团和师一级也设立了卫生部，团设卫生队，连设卫生员；1932 年 6 月 20 日，中央苏区在地方苏维埃政府中建成由内务部兼管的卫生工作领导体系；到 1933 年春夏间，红军的医疗卫生领导体系已基本建立。

中央苏区最早的红军医院，是 1928 年 10 月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团在东固根据地三彩山坑里创办的东固红军医院。1929 年 3 月，医院改名为赣西南第一后方医院。此后，随着红军卫生管理机构和行政管理机构的建立健全，中央苏区的医院如雨后春笋，纷纷建立起来，红军先后建立了蛟洋红军医院、茶陵总医院、小布总医院、红军卫生学校附属医院、中央红色医院等中央苏区知名的红军医院。据《斗争》统计，长征前夕，中央苏区已有 10 个后方医院，10 个预备医院，6 个兵站医院，25 个残废医院，1 个疗养院。

鉴于红军医院急需大批训练有素的医务人员，中央军委总军医处处长贺诚于 1931 年向毛泽东提议：“创办一所红军军医学校，以培养自己的医生。”毛泽东当即表示予以支持。1932 年 2 月，中央苏区红军军医学校在于都县天主教堂正式开学，首批学员 25 人，是从各部队送来的 200 多人中择优录取的。在开学典礼中，朱德发表了讲话，要求培养“政治坚定，技术优良”的红色医生。为了给学校一个稳定的教学环境，也便于教学和实践，在学员完成赣州战役战场救治任务后，红军军医学校搬迁到兴国县茶陵红军

1931 年冬，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傅连璋在长汀福音医院创办了一所红军护士学校，并亲任校长。该校从红军中挑选 60 名学员，培训半年后结业工作。1932 年，傅连璋接着开办了中央红色医务学校，1933 年秋，该校合并到红军卫生学校。红军卫生学校从 1932 年 2 月创办到 1934 年 10 月长征时，先后培养了 200 多名军医，为中央苏区乃至新中国卫生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illegible]

**戴济民**（1888-1978），安徽省合肥市人。1930年10月携带全部药品和医疗器材参加红军，曾任中国工农红军总医院院长，并为红军培养医护人员，参加了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战争和长征的医疗保障工作。为中央苏区四大名医之一。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监察局局长、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 女英雄铸神奇\*

巾帼不让须眉。长征途中，女同志与男同志齐心协力、并肩作战。

长征途中，有的女同志病得很严重，但是经过一折腾一锻炼，转而变得健康起来。有四个怀孕的女同志，也在长征中相继产子。但是产后马上就要行动，谈不上休养和调理，即使如此，女同志仍然犹如战士一样坚持前行，不拖队伍的后腿。特别是一位女同志，在藏区生小孩，那时连青稞麦也吃不到，只能靠偶尔分得一点羊肉来供给自身营养，十分虚弱，产后也只是将息了几天便连忙赶路，经过草地，最终，这位女同志安全地到达望口堡。可谓是巾帼不让须眉！

有些女同志负责照料担架夫和看护病员前，一个人要管理三四副担架，他们跟着担架走，有时跟得上前面一副又怕后面一副掉队，跟着后面一副，又怕前面的人没有人照看，所以他们时常前前后后来回跑。部队休息时，她们也要防着伙子开小差，伙子可以打盹，但她们都不敢眨眼，特别是每晚天快亮时，担架伙的身体疲乏了，总想打瞌睡，宿营地还隔若干里，前后队伍都催着赶快走，这时她们就在几副担架之间前后跑，督促和安慰，劝说与鼓励，用一切法子来推动担架伙往前走。有几次担架夫把担架从肩上放下来，躺在地上，实在是走不动了。于是，体力健强的女同志，就代替担架夫扛一肩两肩。她们不惧困难，不怕劳累，坚持完成所肩负的任务，经常以超人的韧劲投入到行军事务中。董必武也感叹道：“这些都是男子所望尘莫及的啊！”

做工作的女同志绝大多数还是自己背行李，当包裹一卸下来，马上又赶去做群众的工作，丝毫不逊色于男子。有两个女同志坚持步行二万五千里，连马都没有骑过！其实，在紧急时把病人背上山去，抬担架，扶病人，女同志们显示出一种异常坚韧和强大的力量！

长征路上，顽强的女同志收起软弱，与男同志们并肩战斗，铸就了世界奇迹！

(曹元荣 熊沁颖整理)

[illegible]

董必武（1886—1975），湖北黄安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历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中央党务委员会书记、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执行委员、最高法院院长、工农检查委员会副主任，参加了长征。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元勋，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社会主义法制的奠基者。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政务院政法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代主席等职。

\*本文根据董必武《女英雄》一文改编，原载董必武、李富春等著《二万五千里》（影印珍藏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 中央红色看护学校

福建汀州（今长汀）有一所非常有名的教会医院——福音医院。1927年8月上旬，南昌起义部队南下广州途径汀州，时任医院院长的傅连璋不顾个人安危，将福音医院变成临时起义部队医院，担负起起义部队伤病员的医疗任务，傅连璋成为最早为红军服务的红色医生。

1930年，红军第十二军军长伍中豪因急性肺炎在福音医院治疗。每天上午，毛泽东和朱德轮流来看他。有一天，毛泽东向傅连璋了解办医院的经费情况，问到：“开办这样一所医院，每月要用多少钱？”傅连璋说：“除原有基础外，每月要补助二、三百块钱。”毛泽东笑着说：“才需要这几个钱吗？那我们可以自己办。将来，我们还要去北京办大医院哩。”

毛泽东向傅连璋大致介绍了当时红军的卫生情况。红军因为战斗频繁，伤员增多，加之南方气候炎热多雨，部队中常发疟疾、痢疾、脚部溃疡等疾病，部队因病减员的情况十分严重。毛泽东诚恳的说：“傅医生，你不但自己要做医生，还要替红军训练些医生才好。”傅连璋这时才明白过来，原来毛泽东这是想要自己给红军培养医护人员。其实，这个问题傅连璋不是没想过，只是考虑到自己只是一个业务医生，救人还行，教人就心里没底了，况且红军大多都是农民，文化水平很低，根本不具备学医的文化基础，该从何教起呢？怎样才能在短时间内训练出医生来呢？毛泽东看出了傅连璋心中的顾虑，说到：“傅医生不要担心，懂多少就教多少，能做多少就做多少。”

傅连璋豁然敞亮了，信心有了，办法也有了，坚定的说：“好！我一定尽力去做！”

1931年，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决定要开办一所中央红色看护学校。1932年1月，临时中央政府内务人民委员会向江西、闽西发出招生通知，让他们各挑选30名愿为社会服务、思想活泼且性情不粗糙、能识文字、年龄在17岁到24岁的学员送到汀州来。

1932年2月1日，中央红色看护学校正式开学，傅连璋任校长。学员很快就集中了，这些学员虽然是挑选来的“知识分子”，但文化水平普遍偏低，因此，每天除了学业外，还特地聘请了一个教师来上文化课。上业务课时，傅连璋念一句，学员们跟着念一句，念了以后，还是不懂。傅连璋心里开始发毛了：“这样学下去，两个月能学到些什么呢？”

一天晚上，毛泽东特意来到学校看望师生，傅连璋便把这些情况向他汇报了。毛泽东略微思索了下说：“傅医生辛苦了，现在情况紧急，我们可以挑部队最常见的病来教，挑部队最常用的药来教。听不懂，就做给他们看。”简单扼要的几句话，瞬间解决了困扰傅连璋已久的烦恼，傅连璋这时才意识到自己不能因时制宜，没有考虑到革命环境下的实际需求，只是一味的刻板的不求变通的按正规学医的条条框框来操作，结果教学效果只能大打折扣。有了毛泽东的提点和指示，傅连璋规定每天上课两次，临床实习两次，业务课堂上遇到疑难问题，就通过实际操作来解决。如讲注射方法，就拿注射器在课堂上当面注射一次。果然，学员们很容易就学会了。

看护学校学员们的校舍是万寿宫破旧的房子，学员们睡的是稻草地铺，穿的是从家里带来的粗旧破单衣，吃的是糙米饭。夜里，大家四五个人合用一盏茶油灯，学习到深夜。最终，学校的第一批学员顺利毕业了，他们大部分被分配到前方部队，小部分成绩最好的被留下来，转入 1932 年秋创立的中央红色医务学校继续学习。

（余梦娇整理）

## 巧印讲义\*

1936年春天，乍暖还寒，工农红军正踏着漫漫长征路。这个山头的冷风飘过，又迎来另一个山头的冷风。当时，红军长征到离芦霍还有十几公里的地方，那里荒凉阴冷，只有零星几户农作人家，卫生学校在那里搭起了临时课堂。

行军途中办学本就不易，况且在这荒山野岭般的地方，办学所要克服的问题接踵而来。师生们遇到的第一个麻烦就是没有讲义，怎么办？红军大多都没什么文化基础，能称得上知识分子的，也就只识一两百字而已。没有讲义的话，上课质量难以保证，全体师生开始着急了。最后，大家决定自己动手印讲义。然而，又一个问题出现了——没有蜡纸，没有油墨，怎么办？

大家没有认输，征服了雪山、草地的英雄是不会被这点困难吓倒的。没有蜡纸，他们就用牛皮熬胶。草地上牛是比较多的，牛皮很好买。他们先去掉牛毛，然后把牛皮放在锅里熬，不知多少温度，也无法预定温度，就慢慢地试验着熬。经过多次失败，才知道胶多了硬，胶少了透墨。

胶熬得差不多了，就把毛边纸放在上边轻轻沾一下，干了以后，就可以用了。

接下来就是油墨的问题。他们在竹竿上绑上破布，把烟囱灰弄下来，再用筛子筛过，掺上油就成了油墨。

从哪儿弄到油呢？牛油是不行的，必须是植物油。最后还是从卫生部找来一瓶檀香油，算是解决了问题。

他们只有一块铜板，为了提高效率，就把它锯成了两半，可以两人刻。一个人每天要刻上八张蜡纸，划时稍一用力就划破了，力量太小又透不过去。在这种纸上，刻这么多，的确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刻好以后，两个人拉着蜡纸，小心翼翼地印起来。

当他们第一眼看见自己在蜡纸上刻上了字，最后印出了“书”，那种欢喜若狂的快感，大概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一切都很难！每位同志脸上都带着暖洋洋的笑意！

（余梦娇整理）

---

\*本文根据周泽藻《印讲义的故事》一文改编，原载沈阳医学院校史编纂委员会编《红色医生的摇篮》，辽宁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

## 误把吗啡当奎宁\*

聂荣臻至今还记得第四次反“围剿”期间的一件事。一次作战后，红军从战场上缴到了一些西药。有的西药上没有标签。从外形和气味上看，很像奎宁。那时，部队发疟疾的很多，急需奎宁，军团卫生部就把它当做奎宁发下去了。

军团部是近水楼台，机要科黄科长和警卫连指导员正发疟疾，就先服用了。他们随即产生过度兴奋、烧心、恶心等强烈反应，发了疯似地在山上跑上跑下，乱抓自己的心窝。原来那批没有贴标签的药品是吗啡，不是奎宁！

难道是敌人在搞破坏？军团部对此事高度重视，于是赶紧追查。先追查到军团部的游胜华医生，但他是瑞金中央红色医务学校毕业的，是自己培养出来的“土”医生，本人是党员，家庭是贫农，难道是他搞破坏？似乎不会。再往上追，药是军团卫生部发下来的。当时在军团卫生部当医务主任是戴济民同志，外号戴胡子，他在吉安城内开私人诊所，是红军打下吉安时，动员他出来参军的。是否他是 AB 团？应该也不是。再往上追，当时军团卫生部的部长是姜齐贤同志，他在被红军俘虏以前是国民党的中校医官。他是否他有可能呢？很可疑！

当时，军团部个个都很紧张，旁人也替他们捏把汗，所以聂荣臻亲自参与调查处理这件事，发现确实是误用了药，并非蓄意搞破坏。

后来，他就给卫生部规定了一条，今后凡是缴到没有标签的药，先找有制药经验的人辨别判断，然后给狗吃作实验，证明没有毒性才允许给人服。聂荣臻还告诉那些被怀疑的人要接受教训，细心工作，安心工作。

这样一起人命关天的错案才算避免。这件事也让许多人懂得正确的保卫工作，因为保护好人跟打击坏人同样重要，都是绝不可疏忽大意的。

(陈水清整理)

[illegible]

聂荣臻 ( 1899-1992 ) , 四川江津人。1931 年底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 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 第一军团政委。1932 年后任东路军政委。1955 年被授予元帅军衔。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始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新中国成立后, 历任中央军委秘书长兼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科委主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

\*本文根据《聂荣臻回忆录》(上)中相关内容改编。

## 一 篮 鸡 蛋 \*

“医生，收下我们的鸡蛋吧”，刘达看着这些鸡蛋，内心汹涌澎湃，眼睛噙满了泪水。作为一个刚来到医院的医生，他没有做好怎样拒绝的准备。

看着这个站在自己面前的伤病员，虽然黝黑的皮肤，但还是可以看出他还很年轻，瘦弱的身躯压着拐杖，木质拐杖显得有些破旧，但“时刻准备着，早日回前线—第一后方医院二所”几个大字还是那么醒目。李达知道，每到逢年、逢节，宁都安福附近的群众都会自发的到第一后方医院慰劳伤病员，送肉、送鸡蛋、送蔬菜，而这些鸡蛋就是这个伤病员平时积攒下来的。

刘达内心有点矛盾。医务人员的生活确实艰苦，每人每天只有半斤米、五分钱油盐柴菜钱。米用饭盒子煮，分量很少，基本上不够吃。收下伤病员为表示感谢送的鸡蛋似乎也没什么不妥。但刘达猛然意识到，伤病员每天除米以外有一角钱或一角二的油盐菜钱，每人有个草垫子和一床棉被，在严重缺医少药的情况下，伤病员自身如此艰难。我怎么能收下他们的鸡蛋呢？

“同志，谢谢你的好意，你比我们更需要它，你吃了它，身体就更有抵抗力，就可以更早的康复，早日回前线消灭敌人呢！”

“可是，你们工作多辛苦呀，没日没夜的照顾我们，一有空还要军事训练”，伤病员焦急的说。想到前几次，伤病员把节省下来的一点粮食给工作人员吃，工作人员都坚决的谢绝了。刘达突然想到了办法，说：“你我都是革命同志，哪分你我，你吃了就是我吃了”，。

伤病员有点难为情，一时不知所措，挽着的鸡蛋篮子不由地缩了点回去，刘达趁机挪开了位子。刘达抬起头，看到这位伤病员难过的样子，不禁流下了感动的泪水。

（曹元荣整理）

---

\*本文根据刘达《红军第一后方医院在宁都县安福的情况》一文改编，原载陈毅，肖华等著《回忆中央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



## 巧借俘虏掩护伤病员\*

中国共产党从人道主义出发，制定了优待俘虏政策，这一政策也成为我军瓦解敌军和争取白军参加革命工作的有力武器。

在第三次反“围剿”战斗中，红色第一分院的一个重伤连遭到一路敌军的突袭，80多名重伤员无法及时转移，医务工作人员也不得不暂时隐蔽在附近森林中待机救援。敌军突如其来的袭击使工作人员万分焦急，就在大家认为重伤病员全部遇难时，重伤连连信员报告说这连没有一个被杀害。问其原因，竟是几个重伤俘虏起了作用。

原来当时敌情紧急传来，这个连表现出了出奇的镇定与团结。他们一面忙于清查，销毁可能被敌人怀疑的物证；一面动员俘虏，让重伤俘虏教会其他伤员冒充敌军某师、团、营、连士兵的方法，待敌人来搜查共产党员时，他们随着俘虏口气，一起骂开：“你们打完仗跑了，丢掉我们重伤不管，幸亏共产党救了我们，并优待我们吃穿看病，都和红军一样。我们天天等你们把我们接回去，你们今天来了，不但不接我们回去，反倒要把我们的救命恩人赶走，还搜杀共产党人，你们这些没天良的！不把我们抬去，往后我们也会在这里饿死，与其饿死，不如把我们一个个地杀死才好呢！让你们也好好安逸做官吧！”大家骂开了，甚至有的拿拐杖打开了，打得敌人乱窜。最终，全连幸免于难。

事后，这个智举传遍了各院各连，红军再遇到敌情就同样做，收到的效果很大。

(游静整理)

---

\*本文根据戴济民《巧借俘虏掩护伤病员》一文整理，原载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后勤工作·史料回忆》（1），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

## 师长献盐\*

张子清同志是1928年底到小井红军医院住院的，当时年纪虽不大，但在部队中威信很高。当时，由于医院缺乏消毒药品，只能采用盐水消毒，而且有时候盐也得不到及时供应。那时候，红军主力将要转移出去，外科药品十分紧张，有一个星期后期部门食盐供应不上来，伤员洗伤口用白开水。

张子清同志以身作则，自己伤很重，但他却常说：“我是一个轻伤员。”总是把盐水让给别的同志。战士们也是如此，重伤员把自己当轻伤员，特别是党员、干部、班、排长一级的，要他们离开火线真不容易，就是送到医院，他们还要把药品让给别人。

在一个多星期供应不上食盐时，剩下最后一杯盐水，院党组织研究，决定给重伤员洗。张子清同志是重伤员，给他解绷带换药时，他硬是不肯，说：“我不洗。”医务人员拗他不过，只好给其他伤员洗，而战士们则要医务人员一定要留些给张师长用。他们接受了战士们的建议，给全体伤员洗完后，再去给张子清同志洗，他发现了是有意留给他的，说：“不对，那么一点盐水怎么还会有多呢？”接着就批评了医务人员。在这之前，食盐还没有完全断绝的时候，全体伤病员出于对张子清同志的关心，送了一点盐给他，最多不超过一二两，张子清同志用油纸包得好好的，后来把它拿出来，交给了院党组织。张子清同志的行动感动了全体同志，大家说：“要向张师长学习，那些青年团员、战士都表示要争取早日回到前方多杀敌人，争取做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张子清同志的模范行为，更激发大家的战斗热情。当时红军主力四个团决定转移到敌人后方去，要求留下守山的部队坚持半年，说半年后全国的政治、军事形势一定会起变化。当时茅坪等地大批的伤病员都来这里集中，决定张子清同志也留下，但是他那个部队的战士知道后，准备把他抬着走，张子清同志说：“我不能走，只要有伤病员不离开井冈山，我就不能例外，我是共产党员。”并对来看他的那个代表说：“你回去给大家讲，要团结一致，才能战胜敌人，如果抬我走，就会拖累部队。你们不用担心我，就是敌人攻破了井冈山，还有井冈山这么多群众，这么多伤病员在一起。”

杜修经曾感慨地说：“子清同志是个不可思议的人。”

毛泽东纠正说：“不！他是一个赤胆忠心的钢铁战士。”

---

\*本文根据肖明《回忆红军医院》一文改编，原载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编《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

1929年1月下旬，敌人大举“围剿”井冈山，8月，红五军返回湘赣边界，张子清被转移到永新，终因缺医少药，久治无效，于1930年春逝世，终年29岁。他的遗体被安葬在永新城郊风景秀丽的东华岭上，那一天，上千军民群众前往送葬，表达对他无尽的哀悼和思念。

[illegible]

87

## “红小鬼”看护班行军记\*

提起红三军团卫生部的小鬼看护班，上自军团长彭德怀，下至普通战士可谓是无人不晓、无人不晓，特别是卫生部的老同志们仍然是念念不忘的。在长征路上，小鬼看护班跋山涉水，一边行军走路，一边护理伤病员，发扬救死扶伤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战胜了长征路上的各种艰难险阻，为部队伤病员恢复健康、增强部队战斗力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在部队每天出发行军前，班长邹顺同志都要对全班同志进行分工，并提出要求。其中有的打前站，有的护送坐担架、骑牲口或步行的伤病员，有的负责上门板、捆稻草、打扫卫生、归还借物、检查群众纪律和走在本队后面做收容工作。

打前站同志的主要任务，是提前到达宿营地后，迅速做好伤病员的治疗和食宿等准备工作。如烧开水、做饭、消毒器械和准备药品、敷料，并设临时病房，向群众借门板、稻草，铺好病床等。此外，还有一个任务是做群众工作，向群众宣传红军的政策，调查地主、土豪、奸商情况，做些筹粮、筹款、筹药的工作，并物色一些积极拥护红军的、可靠的贫苦农户，预作安置不能随队行动同志食宿。

护送坐担架、骑牲口或步行伤病员的同志，除携带自己的被褥、衣物外，还要携带药品、敷料等医疗用品，以便随时能做好对伤病员的医疗护理工作。在行军中间休息时，看护员要迅速紧张地开展护理工作，给伤病员烧开水、服药，协助医生检查伤员伤口有无出血，包扎是否脱落，伤病情进展或转愈情况。到达宿营地，看护员就更为忙碌。别的同志去休息了，看护员却还要给伤病员测体温、送药、给开水，协助医生给伤员换药和纠正包扎。还要为重伤员端洗脸、洗脚水，喂饭，铺床等，直到把伤病员安排妥当之后，看护员们才能去吃饭、休息。无论是白天、黑夜、晴天、雨天、行军或作战，始终如一，从来没有人发过怨言。

护送伤病员行军，掉队之后则需要克服更多的艰难困苦。首先，要对付饥饿和寒冷的威胁。不能同部队一起行进，就需要自己解决食宿问题。看护员和伤病员都不可能背更多的干粮，在缺粮的情况下，看护员同志们总是把干粮让给伤病员先吃，自己常常以野菜充饥。粮食没有了，要想办法到老乡家中去买粮或挖野菜，粮食和野菜都找不到时，

---

\*本文根据饶正锡《长征时期红三军团卫生工作片段》中“红小鬼看护班”一文改编，原载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编《创业维艰——回忆红军时期的卫生工作》，人民军医出版社 1983 年版。

只好忍饥挨饿。单独宿营，也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若能借居老乡家中，当然是件幸事。但在有的时候，行军于渺无人烟的荒山野岭之中，特别在过雪山、草地时，没有民房可供借住，只好露宿。这在夏季的晴天，问题尚不大，若遇上大雨倾盆，冰雹骤下的日子，或雪花飞舞、寒气袭人的时候，几个人辗转于树下草丛，那种艰苦情况，是难以想像的。

除去受饥寒之苦外，还要对付敌人的袭击。部队从马尔康向黑水进军的那天，邹顺同志护送两名伤病员随部队行动。由于一位患痢疾，走一会就要大便，另一位骨瘦如柴，身体虚弱，步履艰难，加之部队行军速度快，于是他们同部队的距离，就越拉越长了，到下午时，掉离部队已经很远。翻过一座大山，他们走进了一条狭长的幽谷。在这狭谷里，抬头仰望，唯有一线散布云霞的天空映入眼帘，低头俯视，但见一条弯弯曲曲的小溪从脚旁流过，两边陡峭绝壁上的树丛中，时而有不知何种动物的嘶叫声传来。随着天色的渐渐转暗，这狭谷显得更加阴森。突然，他们发现路上有一滩滩的鲜血。再往前走，看到路上躺着一个被人杀害的红军战士，这显示：前面一定有土匪。

就在这时，从前面传来一个沙哑的嗓音在喊：“快来人呀，抓土匪！”他们顺着声音传来的方向奔去，发现是一位被土匪砍成重伤的伤员在叫喊，在他的身旁，还躺着一位已经牺牲的红军战士。当邹顺同志包扎好那位重伤员时，即听到土匪的嚎叫声。在他们前面距离几十米的地方，有几个土匪手持大刀，正张牙舞爪地扑过来。看着身边倒下的战友，怒视穷凶极恶的土匪，他们迅速以充满仇恨的子弹还击敌人。刚打退了这股敌人的进攻，后面又传来一阵急促的喊叫声。原来是几个土匪在追杀两个手无寸铁的红军伤病员，于是，他们又立即向后面追来的敌人开了火。就这样，在单独护送伤病员行进的路上，他们同伤病员并肩战斗，曾多次打退了小股敌人的进攻。有些看护员同志还在保卫伤病员的战斗中光荣牺牲。

由于作战和饥寒患病、过度劳累等原因，红三军团卫生部的红小鬼看护班从中央根据地撤出来的十六人中，有十二位同志在长征中光荣地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他们那种全心全意为伤病员服务，与伤病员同生死和共患难的阶级友爱精神，一直留在红军战士的记忆中，时时鞭策着红军战士奋勇向前。

（李壮壮整理）

## 医护兵智歼残敌\*

1931年春天，一次战斗刚结束，大部队继续向前追歼残敌。这时天还没亮，军医处伙夫老张正在劈柴，忽然一个人影窜到伙房。老张仔细一看，原来是一个白军，身上还背着驳壳枪。老张非常机警地举起斧头向白军劈去，白军急忙响跪下求饶：“兄长，求你救救我！饶了我的命吧！”老张说：“好，缴枪饶你。”白军乖乖地把驳壳枪和子弹都交给了老张。

伙夫老李、老吴也来到了，问：“你是怎么来的？”“我是从东面那个山上下来的，我看见这里有火光，想必有老百姓，想给我们营长找壶水喝，找碗饭吃。一天没有吃饭、喝水，饿坏了，也渴的不行！”白军说着就动手拿瓢在水缸里舀了一瓢水，“咕咚咕咚”喝光了。老张又问：“你们有多少人？有多少枪？”“有三百二十多人，有三百多支枪。”“昨天打了一天仗，你们为什么不缴枪呀？”“我们营长看到观音崖那样险要的阵地，又有两个营把守，都被你们打下来了，别的山头你们也占了，人也叫你们给消灭了，我们就没有敢动。”他用手指着东面那个山顶说，“我们打算先躲在那里，等你们追过去，再逃走。”

经过这一盘问，已经完全弄明白了残敌的情形。处长听了报告后，起头很着急，因为我们没有队伍，怎能缴获一个营的枪呢？想了一会儿他叫传令兵把担架班、看护员和能走的轻伤员都找来，一共四十多个人。处长给大家说明情况后，并布置我们的阵势说：“你们假装是个团部的指挥机关，我扮团长，大家注意不要暴露我们是医疗单位，你们现在赶紧去找些家伙：木棒、锄头、铁镐都好，准备好后听我指挥。”处长吩咐两个传令兵去带俘虏，传令兵带来俘虏后向处长报告：“报告团长同志，白军营长的马夫已经带到，请指示！”处长说：“好！”他询问一番后，接着就解释红军优待俘虏政策：“红军一贯是优待俘虏的，缴枪不杀。愿回家者发给路费，愿在苏区耕田者分给田。愿参加红军打反动派者欢迎你们。你们要想活只有缴枪一条路；要想不饿死，不渴死，也只有缴枪一条路。我是红四军十一师三十二团王团长，对你们保证：只要你们缴枪，不给你们任何虐待，保证你们的生命和私人钱财的安全。”俘虏兵听了之后，微笑着说：“是，是长官，我明白了。”处长接着说：“你回去把我说的话告诉你们营长，赶快缴枪！”俘虏

---

\*本文根据游胜华《医护兵智歼残敌》一文改编，原载张云逸，杨志诚等著《星火燎原》（第十二卷），解放军出版社2009年版。

说：“是，是官长，我一定遵令告诉我们营长。”处长告诉传令兵小刘说：“你把他带到伙房去，叫他吃得饱饱的。”小刘正要走时，处长又说：“给他的营长也带上几碗饭一碗肉去。”同时故意大声地告诉传令兵小王说，“你去告诉司号员吹集合号，去把一、二、三营营长叫到我这里来。”原来我们的伤员中有两名司号兵，一会儿集合号响了，俘虏兵信以为真，正好伙房的饭煮好了，猪肉炒笋子也好了，伙夫老张给这个俘虏盛了半洗脸盆饭，又盛了一大碗肉，说道：“吃吧！不够了再盛。”这家伙真像是饿了几辈子似的，狼吞虎咽地几分钟就吃完了。老张又拿洗脸盆盛了半盆饭、一大碗笋子炒肉给他，说：“这是给你营长的，吃饱了一定要缴呀！”俘虏连声答道：“是，是……”，边说边向外走。这时传令兵小张来了，说：“团长请你再去一下，还有吩咐。”于是俘虏第二次来到了军医处长这里，处长对他说：“你也吃饱了，你们营长的饭也带上了，我现在命令你们营长今晨六时三十分把你们的队伍带到村东头，听我的口令缴枪，过了时间我就要向你们发动攻击了。”俘虏说：“是，是，长官，遵你的命令办……”

俘虏兵走了之后，李处长作了战斗部署。他指挥担架班和一些轻伤员占领村西的山头，处长带传令兵、伙夫和看护员占领村东的山头，把重伤员转移到了村南的山沟里，每一个山头上有十多枚手榴弹，并把木棒、锄头等用锅灰涂黑，伪装成枪支。果然，六点多钟时，那个白军营长带着一营人，狼狈不堪地从山上下来了。处长对军医处的同志们说：“有希望！我们能捉一营俘虏兵，这是破天荒的好事情。”大家都很高兴，心情非常激动，浑身发热、冒汗，心跳得厉害。当他们走到村东的一块草坪上时，我们处长厉声地发出口令：“把枪架起来！把子弹、手榴弹、刺刀都放下！把手举起来！向前开步走！”这营敌人乖乖地离开武器，举着手向前走去，约走到一百五十米以外时，我们的司号员吹起了冲锋号，号声和哨音响成一片，震动了小山谷。军医处的同志像疾风似的拥上前去，刹那间就占领了敌人放下武器的那块草坪。短枪、驳壳枪、七九步枪都被我们缴了。轻伤员、担架兵、看护兵、伙夫每人都武装了一条好枪。可是那营俘虏兵还一股劲向西面走去，这时李处长才发出了“立定”口令。他带着两个传令兵和担架班，走到俘虏们跟前，训了一通话，宣传红军的优待俘虏政策。就这样我们军医处的几十个同志，收拾了敌人一个营。

（李壮壮整理）

## 第一所红军卫生学校\*

在红军初创时期，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严密封锁和疯狂“围剿”，红军中的医务人员和药品器械都极度缺乏，伤病人员得不到及时的必要的医疗救护，严重的影响着红军的战斗力。为了适应当时频繁战斗的需要，加强红军的卫生工作，党决定调派一批医务人员到中央苏区工作。

1931年4月，贺诚被派到当时中央苏区军委所在地江西龙岗，组织总军医处。贺诚是人民卫生事业的开石者，原名贺宗霖，1901年出生于四川三台县（今属射洪）一个农民家庭，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医学院。毕业后，党指示参加北伐战争，先后任军医医务科科长、医务主任等职。贺诚对自己从白区到苏区，从在白区搞地下工作到直接为红军战士服务，感到非常高兴。对于对如何开展红军的卫生工作内心无把握，他决定先去部队了解情况。不久后，贺诚到部队中进行调查，那是反“围剿”战斗最激烈的前线。

贺诚听说毛主席正在这里指挥打仗，他带着期待的心情专程去了前委司令部。在一位工作人员的指引下，贺诚见到了正在休息的毛主席。由于战斗紧张，毛主席常常通宵达旦地工作，研究战地情况，处理来自各作战部队的电报，夜里根本睡不着觉，只有在白天抽空合一合眼。贺诚不想打扰主席休息，就想退出房间。但此时毛主席已经醒了，看见贺诚，毛主席就站起来亲切地握着他的手，招呼他坐下。

毛主席问：“总军区处的情况怎么样？你们几个人？”

贺诚说：“我们一共四个人，后方的事才开始搞。前方的情况有点不了解。”

毛主席鼓励道：“生疏不要紧，多调查多研究，慢慢就熟悉了！”毛主席接着说道：“军部建立卫生机构外，从连队到师都要建立卫生机构，设置卫生人员……要注意加强对卫生人员的政治思想工作，要向广大干部战士宣传卫生知识。”

毛主席的话深深鼓励了贺诚，增添他做好工作的信心，消除了他心中的许多顾虑。从这次会面以后，凡在工作中遇到了什么困难，解决不了的问题，只要有机会，贺诚就会向主席请示和汇报，每次都能得到主席的明确指示。

不久，贺诚等人按照毛主席对卫生工作的指导，陆续在团设卫生长，在连队和各机

---

\*本文贺诚《忆毛泽东对红军卫生工作的关怀》一文改编，原载高恩显、高良等编《新中国预防医学历史资料选编》（1），人民军医出版社1986年版。\\



关单位设卫生员，分别组建了野战医院、兵站医院、预备医院，后方医院等医疗机构等。使前后方医疗机构既有分工，又互相配合。为了便于领导，统一了从连队到各方面军的卫生机关，职称编制等。在普及卫生知识等方面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在毛主席的指挥下，前线战斗节节胜利，但贺诚等人发现医务人员的数量，水平和卫生工作的现状，远远不能满足形势发展和作战的需要。他们向党中央毛主席提出打算办医务学校，培训自己的医护人员的建议。毛主席肯定了这个建议，并且关切地问了许多具体情况，然后指示说：“要注意重视政治教育，培养红色医生。”根据主席的指示，贺诚等人于1931年冬在江西兴国基塘附近创办了红军第一所医务学校——中国红军卫生学校，并且把毛主席关于培养政治坚定，技术优良的红色医生的指示，作为办学方针。在教学中，贺诚和其他教员坚持坚持教学与理论相结合，把部队常见病的治疗作为教学的重要内容。在较短的时间内培育出一批有政治觉悟，又能解决实际问题的卫生人员，大大扩充了红军的医疗卫生队伍。

1931年9月下旬的一天，毛主席在水头庄作了关于第三次反“围剿”胜利的总结报告和“九一八”事变情况的传达，使同志们进一步了解当时的时局和贺诚等人的作战计划。

会后，毛主席对贺诚说：“总医院政委，党委书记调任总司令部后方主任，由你去总医院接替他的职务。”

贺诚回答说：“政治委员，党委书记的工作过去没有做过，怕是干不了啊”。

毛主席和蔼地说：“边干边学嘛！只要多接近群众，虚心征求大家的意见，不愁做不好工作，你去了，还是先调查研究，了解情况，要加强对医务人员的思想工作，要他们好好为伤病员服务看病要仔细，态度要好。”

从和毛主席的谈话中，贺诚获得了巨大的精神力量。怀着这样的心情，贺诚来到了设在兴国莲塘的中央工农红军总医院。刚到医院上班，贺诚就收到一份死亡报告，一名红军战士因长疥疮牺牲了。贺诚听了后大吃一惊，十分痛心。顿时想起来时毛主席的指示，更感到肩上的重任，一定要把党和毛主席的关怀，送到每一个红军战士身上。当贺诚走进用茅草搭的病房里看到病员缺少床位和被子，躺在稻草堆里条件异常艰苦。除此之外医务人员人手少，还有，医院里药品极度缺乏，动手术用的器械像锯子之类也是从当地木匠那里借来的。由于缺乏麻醉药品，做手术时伤病员还要忍受很大的痛苦。贺诚等人立即召集全院医护人员传达了毛主席关于要爱护伤病员的指示，并在党委会上提出了医院工作应以“一切为伤病员”作为全院各行各业方针，党委一致通过这个提议。

据此，贺诚等人广泛地对医务人员进行政治思想教育，提高大家的阶级觉悟，增进对伤病员的阶级感情。贺诚还特别是对国民党投诚过来的、没有得到教育改造的卫生人员加强了教育，定期检查每个人的政治表现和工作态度，很快使医疗作风得到较大改进。

有一天，毛主席特地到医院去看望伤病员，并进行慰问和检查工作，主席热情地询问伤病员的生活，察看伤病员的伤势，安慰他们安心养伤。贺诚边跟随主席看望伤病员，一边向主席汇报医院情况。当谈到药品器材仍然缺少时，毛主席说：“这些都要自己动手解决困难”。毛主席的话指明了解决问题的方向，贺诚问主席能否自己办工厂，主席肯定了这个想法。于是，在毛主席的大力支持下，他们自力更生办起了中国工农红军医药卫生器材厂，制造出大量的医用棉花，纱布，绷带，还有一般的外科器材和中西药品。没有制药原料，他们就上山采集草药。为了适应行军作战的要求，他们还改革剂型，把中草药磨碎做成片药，丸药，便于发放，携带和服用，深受部队欢迎，这样一来，红军严重缺乏药品器材的情况有了好转。

1932年春季，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不久，毛主席受到‘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排挤和打击，离开前线，在后方任苏维埃政府主席的职务。在这样的情况下，毛主席依然关心红军卫生工作的开展。毛主席在1933年的《长岗乡调查》这篇著作中写道：“疾病是苏区的一大仇敌，为它减少疾病以至消灭疾病，是每个乡苏维埃的责任。这使得贺诚等人对卫生工作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主席还亲自主持会议并作了在目前情况下条例的要求不要过高，要研究实际情况从实际出发起草条例的指示。他们按照主席的指示精神制定了可行的管理条例。后来按照条例，每个乡都建立了卫生委员会，积极开展群众性的卫生普及运动，对革命根据地建设发展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佚名整理）

## 吃水不忘挖井人\*

在中央苏区，民众的卫生知识非常缺乏，卫生习惯传统而落后。

在瑞金城外，有个村子叫沙洲坝，毛主席在那儿住过。

一天，毛主席看见一个老乡挑着浑浊的水往家里走，就问：“老乡，这水挑来做什么用呀？”老乡回答说：“吃呀！”毛主席疑惑地问：“水这么脏，能吃吗？”老乡苦笑着说：“没法子，再脏的水也得吃呀！”毛主席又问：“是从哪里挑的？”老乡回答：“从塘里挑的。”毛主席请老乡带他去看看。走了一阵，只见一个不大的水塘，杂草丛生，池水污浊。全村人洗衣、洗菜、吃水全在这里。毛主席关切地问：“能不能到别处挑水吃？”老乡摇摇头，说：“我们沙洲坝就是缺水呀！挑担水要走好几里路。”毛主席皱了皱眉头，若有所思地走了。第二天，毛主席找来村里人一起商量挖水井的事。大家一起勘察水源，选择井位。当井位确定后，毛主席挽起衣袖，卷起裤腿，带头挖了起来。于是，大伙挖的挖，铲的铲，干得热火朝天。

在挖井的日子里，毛主席和临时中央政府的其他领导人，一有空就到工地参加劳动。经过十几天的奋战，水井挖成了，沙洲坝的人民终于喝上了清澈甘甜的井水。群众激动地说：“我们从来没有喝过这么甜的水，毛主席真是我们的大恩人哪！”

解放以后，沙洲坝人民在井旁立了一块石碑，上面刻着：“吃水不忘挖井人，时刻想念毛主席！”

（曾新华整理）

---

\*本文《我们伟大的祖文》一文改编，原载国家图书馆 1951 年 10 月 12 日《人民日报》的影印本。

## 救治白军伤兵\*

“红军医院”，顾名思义就是医治红军伤病员的医院。然而，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红军医院的医生和护士，在艰难的条件下，秉承救死扶伤的天职，不论是红军战士，还是白军俘虏伤兵，他们都一样对待。

胡月花是吉安富田红军医院的一位护士，心地善良，非常有耐心，精通药理、临床。在医院的几个护士中，她是“大姐”。对待伤病员就像亲兄弟一样，换药、擦洗伤口都非常细心。

一天，医院里住进一个第二次反“围剿”俘虏来的白军士兵。时为夏天，他伤在腿上，化了脓，发着腥臭味，苍蝇在伤口嗡嗡地飞。胡月花按着鼓鼓的脓包挤脓，白军士兵觉得痛，又喊又骂，还要打人。其他护士看不下去了，指着他说：“嚷什么嚷？你还有没有良心啊？你是个俘虏兵，没有资格在这里大喊大叫。”

胡月花急忙站起来，劝那位护士走开，转过身子对那位白军士兵笑笑说：“她还小，不懂事，别理会她。这个脓包很大，是会有点疼的我给你轻轻地挤吧。”她边说边给他轻轻地挤。白军士兵不出声了，咬着牙、皱着眉、咧着嘴，想喊又不敢喊出来。大姐看着，心里也难受，于是俯下身子用嘴巴给他吸脓，吸完后再给他上药，并安慰他很快就会好的。

白军士兵泪眼汪汪地看着胡月花，感受着她无微不至的关怀，心里很受感动，但什么也没说。还没有等腿伤完全好，他就急着要出院。不久以后，这个白军伤员回到原先的部队，带着十多个弟兄，投奔红军队伍。因为他们了解到红军不仅不杀俘虏，还把白军伤员送到医院治疗，像亲兄弟一样对待。

——世界上哪里还有这么好的军队啊！

(陈雪婧、彭福华收集整理)

---

\* 本文选自《井冈山的红色传说》，张泰成主编，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

## 中医中药显神威\*

在两年零四个月伟大的井冈山革命斗争中，中医人及中医药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建立了卓著功勋。

### 茅坪名医让私宅

上井冈必到茅坪，到茅坪必看八角楼，因为八角楼的故事已经成为中国革命史上不朽的记忆，八角楼的灯光也催生了中国革命胜利的曙光。而这个八角楼的主人正是当地名中医谢池香先生。谢池香是当年井冈山地区积极支持和参与革命斗争的诸多中医药人员中最值得提及的一位。他自幼跟师学医，精勤业术，悬壶乡里，德高望重，与井冈山绿林首领(后成为著名红军将领)袁文才是忘年之交。

当1927年10月袁文才迎接毛泽东和工农红军到达茅坪时，这位热情而诚挚的老中医宁肯自己一家挤在窄小的老屋里，却执意将八角楼腾给毛委员住，将另一房间让给朱德夫妇居住，同时又腾出三间房子安排前委的秘书及其他工作人员使用。这是毛泽东、朱德等同志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居住时间最长的革命旧居。正是在这个谢老先生的八角楼里，毛泽东完成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两篇重要著作，为井冈山红色根据地的建立乃至整个中国革命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指明了前进方向。

### 红军医院有中医

井冈山革命斗争是艰苦卓绝的。国民党湘赣两省政府对井冈山根据地进行频繁的军事进攻，并采取严密的经济封锁。根据地不仅生活物资极度匮乏，而更重要的是与敌军的残酷军事斗争造成红军战士的大量伤亡，伤病员的救治成为红军必须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

在这种极为困难的境况下，红军用杉木、树皮等先后盖起了红军医院，还招收了部分中医药人员(后成为医疗救治的主力)。据资料显示：创办于井冈山斗争之初的茅坪红军医院，就有吴鹏飞、赖章达、陈金、黄少左、谢贻阶等中医药人员；创办于1928年6月的小井红军医院，就有谢秋月、李琛山等中医药人员。同时，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各县，都有中医药人员为红军和当地群众治病疗伤，他们为根据地的建设、发展做出了不

---

\*本文根据曹正逵《中医药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一文改编，原载 中国中医药报第3534期，2011年6月24日

可估量的贡献。

## 中医中药显神威

《井冈山的斗争》一文曾记述：“作战一次，就有一批伤病。由于营养不足、受冻和其他原因，官兵生病的很多。医院设在山上，采用中西两法治疗。”

为了打破敌人的严密封锁，解决红军及群众的基本医疗救治问题，红军领导机关高度重视、充分发挥中医药的独特作用。当时毛泽东就做出明确指示：鉴于根据地缺医少药，必须发挥中医中药的作用。

正是在这种药品器械十分缺乏的特殊背景下，红军医务人员自制竹镊子、竹软膏刀、竹药筒等，上山采集中草药，学习民间验方，动手配制中药，用来医治伤病员。据记载，当时红军医院的中医药人员采集的金银花、土茯苓、木通、麦冬、厚朴、金樱子、车前草、五加皮等中草药近百余种。他们不仅用这些中草药进行常规治疗，而且还用金银花等清热解毒类药进行器械消毒和外治枪伤；也常用一些简单易行的中医药方法防治感冒等流行性疾病。

原人民解放军上将、总后勤部部长张宗逊将军曾动情地讲述过自己当年两次受伤在红军医院接受治疗的经历：自己的伤口化脓，久治不愈，“而那些中医就把草根、青草、树皮(一些中草药)混在一起，砸成糊糊，然后敷在伤口上，把脓血都弄出来，再贴上一张膏药，一个星期就好了。”足见中医药在当时伤病救治中的特殊作用与显著疗效。

时至今日，当我们前往井冈山朱毛旧居和诸如边界工农兵政府公卖处、小井红军医院等革命遗址瞻仰学习时，仍然都能看到当年的“中医站”内有药斗、药袋、药桌、药碾以及中草药标本。由此我们完全可以想象，中医药在当年艰苦卓绝的井冈山革命斗争中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黑夜举星火，井冈是摇篮。不知多少先烈，碧血染青山。”是革命先辈、英烈们用鲜血、生命筑就了井冈山革命的千古丰碑，他们所创造的井冈山精神无疑是我党乃至整个中华民族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而当年井冈山中医人在血与火的革命斗争中所做的无私奉献，也应当永远被历史所铭记。

(曾新华整理)

❖ ❖

谢池香：井冈山茅坪名医，八角楼主人。

## 妙法治瞌睡\*

韦荣是我党培养的第一位女军医。韦荣出身贫苦农家，10岁便在当地的一个财主家做丫头，后来被黑心财主卖到妓院。她不甘心于命运的安排，最终从妓院逃了出来并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因为曾在红七军战地医疗站护理伤病员的经历，她被组织推荐进入红军军医学校学习，并最终顺利通过考试，成为19名正式生中的一名。韦荣入学时年仅16岁，当时唯一的女学员。

韦荣相当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她学习相当刻苦，课堂上数她提问最多，课后也老是缠着教员和其他同学问个不停。尽管如此，由于她文化水平太低，学习起来还是很吃力，面对晦涩难懂的医学知识不由自主的就会打瞌睡，有教员在场还好，若是自习，那她便是一发不可收拾。倔强的韦荣可不允许自己被“瞌睡虫”打败，她四处寻找“药方”。一天，副班长范同麟说他有个祖传秘方叫“去困灵”，治疗打瞌睡特别管用，韦荣欣喜若狂，叫范同麟赶紧给她配药。不一会，范同麟就拿来一个子弹壳，略带戏谑的口吻对韦荣说：“给你我家的祖传秘方，使用方法很简单，当你犯困的时候，打开来闻一闻就行了。”韦荣夺过范同麟手中的子弹壳迫不及待地试验起来，没想到子弹壳里装的其实就是胡椒面，韦荣被呛直流眼泪直打喷嚏，见状，在场的同学个个笑得前仰后翻。可是面对范同麟的捉弄，韦荣一点也没生气，她一边抹眼泪一边咯咯的笑着说：“祖传秘方，确实管用！”从此，教室里经常传来喷嚏声，大家都知道，那是韦荣正在跟“瞌睡虫”作斗争呢。

可是，不到半个月的的时间，范同麟的“去困灵”就失灵了，接连两个晚上自习课，韦荣还没来得及去闻“去困灵”，就趴在桌上睡着了。因为功课没有温习好，病理课测验时，韦荣的名次落到了最后。伤心难过的韦荣把“去困灵”狠狠地甩在地上，抑制不住的哭起来。大家手足无措，也不知道怎么去安慰她。痛定思痛，当晚韦荣依然早早的来到教室，但是她没有坐在老地方，她不知道从哪里搬来一张凳子，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她一边啃着锅巴一边看着笔记……不知不觉夜已深了，教室里亮着的松油灯只剩六七盏了，当大家陆陆续续合上书要回去休息时，只听最后一排“哐当”一声，大家回头

---

\*本文根据游胜华《在人民军医的摇篮里——紧张的学习生活》一文改编，原载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部队后勤部政治部编《为了红色中华》，中国青年出版社1984年版。

一看，原来是韦荣摔倒了。大家急忙跑过去把她搀扶起来，急忙问：“好好的怎么摔倒了呢？”韦荣前额鼓起了一个大包，还渗出了一点鲜血，可她没有丝毫郁闷痛苦的表情，相反却笑起来了，大家面面相觑。韦荣指着凳子得意的对范同麟说：“班长，你看，我的‘止睡凳’成功了，它比你那个‘去困灵’强一百倍！”这时，大家才发现，韦荣用的是一张特别的凳子——一块木板和一跟木棍钉起来的独腿凳。

靠着这种悬梁刺股的劲头，韦荣最终以优异成绩毕业，成为中国共产党培养的第一位女军医。遗憾的是，韦荣在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中央苏区照顾一批伤员，不幸被捕，英勇的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胡家浩整理）



## 坚强后盾\*

1934年10月，风云变色，秋风萧瑟，万木悲苦，

苏维埃政府的领导和工作人员，红军的家属和儿童团的小弟弟、小妹妹们，一群群站在路旁，欢送人民的子弟兵。他们手里，有的拿着食物，有的拿着草鞋，还有的拿着银钱，送给他们的儿子、丈夫、哥哥、弟弟和红军战士，千叮咛，万嘱咐：“要早点回来呀！”“多杀敌立功，给家捎个立功喜报啊！”无形中形成的这种集体送别的场面，令人激动万分。太阳在远山后面落下去，夜幕渐渐地笼罩着大地，炊烟袅袅的村庄、金黄色的田野、苍翠的山村，渐渐地变得模糊起来，在队伍的后面渐渐消失了。中央红军主力开始了漫漫的长征之路。

长征行军中，最苦最忙的是卫生员，他们配合做卫生宣传。翻越夹金山时，气候变化大，山下炎热似火，山上冰封雪盖，又缺氧。他们就对大家进行防冻防窒息的宣传教育。同时沿途派上宣传哨，要求大家行军中不要停留，以防意外。路上有了伤病员，轻的一般都随队行动，重的就地安排在老乡家里养伤，留下一些钱，买些必要的药品，使暂时不能随队北上的伤病员得到妥善安置，长征路上，从上到下对伤病员都特别关怀和爱护。找到能吃的东西，首先让伤病员吃；风雨天找到避风雨的地方，首先把伤病员安置好。打起仗来，无论战斗如何激烈，总要千方百计地把伤员抢下来，有时担架上不去，他们就冒着炮火，从火线上把伤员背下来，藏在散兵坑里，待战斗稍一平息，再把伤员运出来。部队的军政首长，经常到卫生部门慰问伤病员，把自己的粮食留给伤病员吃，把宝贵的水留给伤病员喝，感动得伤病员热泪盈眶。那时候，官兵之间、上下之间、同志之间，情同手足，亲密无间，可以说不是手足，胜似手足。

由于部队长期行军作战，得不到必要的补充，物资十分缺乏，担架是硬梆梆的木板钉的，或者用树枝扎的，为了使伤病员能舒服一些，他们尽量在担架上垫上一点拣来的破被子或者树叶、软草，为了对付敌人的飞机，还用树枝进行伪装。行军时，他们总要叮嘱担架员走得慢些，动作轻些，尽量不要增加伤病员的痛苦。那时候，医院没有固定的地方，多数是设在破庙里，就地搜罗一些破旧的桌椅板凳，医疗设备更是少得可怜，甚至连探针、镊子都没有，大家只有自己动手，用竹子制作镊子和探针，外科用的刀、

---

\*本文根据谢华《红三军团卫生工作的片段回顾（二）》一文改编，原载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编《创业维艰——回忆红军时期的卫生工作》，中国人民解放军出版社1983年版。

剪、锯，也都是土造的。至于病房，更是无法固定，有时设在老乡家里，有时设在深山密林之中。医务人员都非常忙碌，也非常辛苦，每天都要做手术，还要翻山越岭，端着盘子挨家挨户地给伤病员换药、服药。领导干部就更加辛苦了，很多事总是领导抢着干。

红军过草地时，粮食非常缺乏，有时只能靠野菜充饥。为了防止食用有毒的植物，他们除了做好医疗工作外，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向部队公布可食用野菜的名称和图样，先是三十多种，后来又增加到五十多种。再以后，野菜也没有了，干脆就宣布：凡是牛、马、羊能吃的植物，人都可以吃。至于药品那就更加困难了，硼酸水、双氧水、红汞、碘酒，那时都是珍贵的、罕见的药品。一个棉球，一块纱布，总是用了洗、洗了用，视如珍宝。注射针头用久了，磨了再用。后来纱布、棉球也没有了，就只能想办法找些代用品。没有药，他们就走一路，采一路中草药、自己动手做成丸、散。就是这样，他们战胜了物资上的极端困难，千方百计减少部队发病，巩固部队的战斗力，红军就是这样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条件下，走过二万五千里的。

红军时期那种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那种艰苦奋斗、坚韧不拔的优良传统，那种官兵一致、上下一致、军民一致的鱼水深情，至今是我们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永远激励着我们继续前进。

（黄菊萍整理）